



第 42 期（总 42 期）
教学管理办公室编制

目 录

■ 新闻动态

北京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2016 年秋季学期新生入学教育及报到注册 活动圆满完成	4
四海名师聚燕园，三尺杏坛齐追梦——北大国培一线初中语文优秀 教师培训班暨 2016 国培项目启航	5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揭牌仪式举行	8
“胡适与北大”专题展在北大图书馆展出	9
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大雅堂”于近期启用	11
杜维明先生捐赠文献藏品仪式在北大图书馆举行	12
“北京大学国子监大讲堂走进北大”暨新学期开学典礼举行	14
北京论坛（2016）协议书签字仪式在北京大学举行	15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开课	17
北京大学、芝加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合作签约仪式举行	20

■ 网教之声

中国 MOOC 该如何发展 -----22

陕师大观念超前 教师在线教育先行一步 -----24

■ 北大人物

苏勉曾：勉运家国 增臻学术 -----27

汪劲武：草木为业 学术为乐 -----33

■ 学者谈读书

贺桂梅：人书岁月 -----40

伍尔夫：一个人要怎样读书 -----44

■ 好文共赏

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 -----55

■ 史苑钩沉

蔡元培为什么要请鲁迅来设计北大校徽 -----62

■ 大美北大

燕园夕照 -----66

■ 学员心声

圆梦北大，为了更大的担当与责任 -----68

编辑寄语

9月25日是鲁迅先生的生日，而下个月，马上就是他逝世八十周年纪念日（10月19日）。很多人对于鲁迅的了解，可能仅限于教科书中所选的文章和几个历史标签，并不真正的了解鲁迅这个人。在生活中，若想要跟一个人做朋友，肯定不能只是仰慕他的文字，你还要知道他的其他方方面面，那才是了解一个立体的丰满的人。这一期选了一篇文章《蔡元培为什么要请鲁迅来设计北大校徽》，讲述了鲁迅设计北大校徽前前后后的一段故事，让大家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认识鲁迅。

祝愿同学们新学期愉快！

主办：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承办：教学管理办公室

编委会组成：

主编：章政

副主编：杨虎、常靖

执行副主编：王凝、杨雯宇、吴晓风

编委会成员：肖志欣、曾玉芬、郑鹁、杨舒婷、刘晴晴、石传芬、唐海峰、孙叶敏、王帅、王迎春、王姗姗、林以晴、高前余、张翼、吴丹、王凯惠、徐燕、张凯、赵晓玲、白永花、司敏、李文文

新闻动态

北京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2016 年秋季学期 新生入学教育及报到注册活动圆满完成

根据北京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2016 年秋季学期工作的安排，本学期新生入学教育及报到注册活动于 9 月 24 日上午 9 时在电教楼 314 教室顺利举行。在京学习中心的近百名新生参加了此次活动。

9 点整，活动正式开始。继续教育学院教学管理办公室王凝老师首先向同学们介绍了继续教育学院以及学院开展网络学历教育的情况，并详细讲解了当天的活动安排及报到注册的流程与要求。

随后，来自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李春老师为新同学们带来了入学第一课——“学风考风与学习方法”讲座。李老师说用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和日本研究员小保方晴子作为正反两个例子来说明尊重学术规范、恪守学术道德的重要性，要求同学们在今后的学习当中要做到诚实、守信、不作弊。同时，李老师在如何开展课堂学习、如何做到学以致用、

如何做到教学相长以及如何付诸行动等几个方面，与同学们分享了学习方法与心得。

讲座之后，班主任王蓬蓬老师为学生做入学教育，详细讲解了网络学历教育的管理规定、学习流程和各项学习要求，同时现场演示了如何选课选考试、收看视频课件、参加视频答疑以及完成网络作业等。

随后，来到活动现场的近百名同学在班主任老师的带领下，参观了北大校园，游览了未名湖、博雅塔、图书馆等知名景点，加深了对北大风物和历史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活动的最后，在教学管理办公室的精心安排和指导下，新生们顺利完成了本学期的报到注册及交费的相关工作。

2016 年秋季学期目前已正式开学，拉开了同学们在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络学历教育学习的帷幕，相信同学们

都会在北京大学拥有一段美好而难忘的学习经历。

来源：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编辑：丁香的耳朵

四海名师聚燕园，三尺杏坛齐追梦

——北大国培一线初中语文优秀教师培训班暨 2016 国培项目启航

2016 年 9 月 20 日，来自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江苏、浙江、广东、广西、江西、福建、贵州、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吉林、辽宁、内蒙古、青海、山东、山西、陕西、新疆兵团 25 个省市自治区兵团的近 100 名一线优秀初中语文骨干教师和教研员齐聚北大燕园。学员们褪去旅途的疲劳，揣着走进燕园的兴奋和憧憬之情，走进北大课堂，开启了北大国培一线初中语文优秀教师培训班的序幕，北京大学所承担的 2016 年国培项目也全面启动。

书记杨虎老师、教学管理办公室和网络培训中心主任常靖老师、网络培训中心副主任张丽老师出席了开班典礼，网络培训中心副主任杨雯宇老师出席并主持了开班典礼，对全体教师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9 月 21 日上午 8 时半，北大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章政教授、副院长党总支副

章政院长欢迎大家“在最美的季节，来到最美的北大”。简明形象地介绍了北大历史、北大精神和北大学风，希望大家把“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北大学风带回去。并列举身边的标语实例，以诙谐有力的方式论证“人一生中最为有用的学科是语文”，希望大家把语文能力更好地应用到教学工作中去。



鉴于阅读在语文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传统文化日益受关注，在开班典礼结束后，副院长、党总支副书记杨虎博士为大家带来第一堂讲座“国学经典阅读与人文素养提升”。杨老师从国学的基本概念和当代价值谈起，再到国学的基本要籍，最后重点讲述国学经典的阅读之法，全场引经据典、谈古论今、娓娓道来、妙语连珠。3个半小时的国学大餐，让老师们既领略了圣贤伟人的大智慧大境界，也于会心一笑中领略了北大老师的授课风采，唤起了他们学习经典的迫切之情。相信杨老师所讲的“知行合一、儒家道家、周易典故、劳谦有吉、最美声音”等讲课情节已深深印在参训老师的脑海里。



下午2时，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郭斌老师向大家详细介绍了这几天的课程安排、研修评价、教学服务和生活服务，根据训前调研，为参训老师设置了三类课堂：专业引领、教学实践、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课堂。力求通过这几天的专家引领解疑、北京重点中学听课评课、工作坊备课说课等活动让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师们在教学上获得更多的启迪，满意而归。



接下来开始了工作坊破冰活动，全体教师共分为10个小组，每个小组在相互认识、选组长、定口号、教学问题交流过程中，老师们配合默契，讨论相

当热烈。各个小组代表上台交流和展示环节，将会场气氛推向了高潮。代表们的精彩言论和展示的小组精美宣传页，让我们不禁惊叹参训语文老师们的多才多艺！

破冰活动后，北大教学团队安排了参观校园的活动。在这个最美的金秋时节，在这座最美的大学校园，沿经图书馆、博雅塔、未名湖…在教学团队的带领和讲解下，在老师们的欢声笑语中，本次国培一线初中语文优秀教师培训班第一天的活动圆满结束。



来源：北京大学继教院网络培训中心

编辑：丁香的耳朵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揭牌仪式举行

2016年9月20日上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揭牌仪式在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副司长徐青森，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校长林建华等来自全国政协、教育部、兄弟院校和北京大学的领导、嘉宾以及中外学者代表共同参加了此次揭牌仪式。

仪式上，朱善璐、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揭牌。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宣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成员名单。朱苏力教授和张辉教授分别代表学术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接受聘书。



朱善璐和邓小南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揭牌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是以人文与社会科学基础学科为主、推动跨学科交叉研究并促进国际交流合作的学

术机构。邓小南在会上详细介绍了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成立的目以及“涵育学术，激活思想”的基本宗旨，阐释了学术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的基本职能，提出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未来的发展目标。

韩启德阐释了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成立的重要意义，在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需要人文和社会科学作为方向盘和刹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提出了对北大文研院的五点期望：坚持学术为先；真正做到学科交叉；合作包容；根据现有的人才确立方向，取得重点突破；以中青年学者为本。

徐青森在讲话中表示，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成立是北大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一步，也是高校的一件盛事。他提出北大文研院应立足基础学科，加强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林建华在讲话中肯定了北大人文社会学科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北大一方面要培养引领未来的人才，另一方面在学术上也要产生可以影响社会的思想——这正是人文社会科学需要做的工作。他表示，北大文研院是一个学

者主导的机构，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者加入到这个机构之中，希望文研院可以聚集国内和全球的优秀学者，共同讨论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



林建华讲话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作为兄弟院校嘉宾发表讲话。刘伟指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学校一定需要伟大的人文精神和深邃的科学思想。罗卫东希望浙大和北大加

强南北互动，共同助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葛兆光、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安德鲁·阿伯特作为中外学者代表发言，分析当前的时代背景，对北大文研院的成立表示祝福和期待。

在揭牌仪式的最后举行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发展基金签约仪式，吴志攀、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水校友共同签约。（校报记者：孟怡然）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白杨

“胡适与北大”专题展在北大图书馆展出

2016年9月19日，“胡适与北大”专题展在北大图书馆展出。本次展览是北大人文社科院揭牌仪式的系列学术活动之一，由文研院联合图书馆共同主办。



吴志攀致辞

9月19日上午10时,开展仪式在图书馆东门展厅举行。仪式由文研院院长邓小南主持,常务副校长吴志攀、图书馆馆长朱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金以林、历史学系欧阳哲生教授先后致辞,介绍了胡适与北大的历史渊源和对北大的贡献、胡适在近现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胡适藏书及档案资料的整理利用情况,并指出了本次展览的重大意义。



展览现场

本次展览分“但开风气不为师”“北大革新的健将”“整理‘国故’的实绩”“北大‘中兴’期的领军人”“追寻大学的理想”五个主题,以图片、实物、投影等多种方式展示了胡适在北大三个时期的主要贡献和学术人生。展览以北大图书馆馆藏为主,倾力奉献有关胡适

的文献精华。此外,展览还得到校档案馆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档案馆的支持,复制展出了两馆的一些珍贵历史文献。本次展览展出展品有140余件,丰富多样,精彩纷呈。展品的图书部分以胡适藏书为主,包括胡适的《红楼梦》《水经注》等珍贵版本收藏、胡适的重要学术著作,以及他与北大学人的往来赠书。此外,展览还展出了胡适与蔡元培等北大学人的往来书信、合影照片,胡适本人的珍贵留影、聘书,以及藏书章、藏书票等。

通过参观本次展览,参观者对于胡适在近现代思想学术史上之卓著影响、胡适与北大渊源之深远流长均可窥见一斑。展览吸引了大量的校内外人士,获得了广泛好评。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山石

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大雅堂”于近期启用

经过多年规划与近一年的维修，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教学科研大楼——“大雅堂”于近期装修完毕，即将正式启用。

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92年，是国内首家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史、哲、考古等领域跨学科研究的学术机构。自成立以来，先后组织编纂出版了《国学研究丛刊》（25种）、编辑大型学术刊物《国学研究》（已出版37卷）与《版本目录学研究》（已出版4卷）。特别是由校内36位教授参加的《中华文明史》（四卷本），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已有英、日译本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和日本潮出版社出版。这些成果曾多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和校级的奖励。在百年校庆期间，研究院举办了27个国家和地区的270位学者参加的“汉学研究国际会议”，影响巨大。国学研究院于2002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先后聘请文、史、哲、考古等方面的著名学者共同担任导师，设置有利于学科交叉的课程，现在已有12届博士毕业，在不同的岗位承担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有的已成为其他高校的国学院院长。

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是国家汉办与北京大学共建的高级学术机构。基地致力于促进中外学术、文化交流，供国外汉学家在中国本土与北京大学共同研究中国文化，并为国际汉语教育构筑坚实的学术基础。自成立以来，基地先后邀请剑桥大学教授 Michael Loewe、David McMullen，巴黎大学教授 Léon Vandermeersch，华盛顿大学教授 David R. Knechtges，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Andrew H. PLAKS，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Lothar von Falkenhausen，京都大学教授高田时雄等14位学者来基地进行1至3个月的专题研究和学术考察，并开设了多门研究生课程，还有一百余位访问学者和青年汉学家在基地进行研修。同时，基地编辑出版《国际汉学研究通讯》（已出版12期）、英文刊物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 Culture*（已出版4期，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两种学术期刊，先后启动了“马可·波罗研究”“域外汉籍文献丛编”“中国文化入门丛书”“国际汉学家信息数据库”等研究项目，组织了“我的汉学之路”“国际汉学翻译家大会”等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近百场国际汉学



讲座，在为校内师生提供最新海外汉学研究资讯的同时，也在国际汉学界获得良好反响。

为支持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的工作，北大校领导于2010年决定，将位于北京大学西校门内南侧的化学北楼整体拨付国学院、汉学家基地使用，国学研究院院长、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任袁行霈教授取东汉班固《西都赋》中“又有承明、金马，著作之庭，大雅宏达，于兹为群”的典故（意谓有品德和学

问的人士聚集于此），为此楼取名为“大雅堂”。国际上有几处汉学研究的高端机构，如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荷兰莱顿汉学院、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都是汉学家向往的地方，而在中国本土反而没有可与之比肩的汉学殿堂。在北大校方的支持下，大雅堂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有望成为与北大地位相称的、融合国学与国际汉学的高端机构。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拉丁

杜维明先生捐赠文献藏品仪式在北大图书馆举行

2016年9月20日下午2点，杜维明先生捐赠文献藏品仪式在北大图书馆举行。捐赠仪式由图书馆馆长朱强主持，杜维明先生、北大常务副校长吴志攀、哲学系张学智教授、高等人文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倪培民教授、信息管理系王子舟教授等出席了仪式。

杜维明先生是国际著名的学者、当代研究和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家、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现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及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主任。杜维明先生在其夫人及亲属的支持下，决定将个人所藏全部文

献资料及其他藏品等约1万5千余册（件）无偿捐赠给北大图书馆。藏书中英文约各半，大部分是为个人研究工作收集的学术著作，其中尤以哲学、宗教及文化为主题的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献为要，其他还有欧美思想史和韩国儒学资料，以杜维明为研究对象的、以中文及其他文种写成的学位论文、专论及专著，陈荣捷（Wing Tsit Chan）和卜爱莲（Irene Bloom）两位儒学名家赠送的私人藏书，以及其他知名学者赠送的书籍、字画和纪念品等。

杜维明先生希望捐赠的图书和藏品能嘉惠学人，有益于儒学的深入研究。他在发言中说，期待大陆从事儒学研究和关心儒家前途的青年是既有本土的根源意识又有国际视野的知识人。他们既可以认同也可以批判前代学者的观点，但他们必须在根源性和普世性方面有所超越，有所突破。面对人类的存活问题，他们不能没有全球乃至宇宙的情怀。同时，他们对自己的传统有切身的体会和由衷的关爱。他们接受文化多样性的事实，但坚持普世价值的理想。他们的任务是在深层发掘自家无尽藏的过程中提出可以和其他文明对话的基本道理。同时在了解“他者”的前提下，开拓自己原来欠缺的领域。杜维明先生期待图书馆界，尤其是北大的图书馆，能够在儒学的深入研究方面，作出文献保障和揭示方面的独特贡献。

吴志攀在发言中说，北京大学一直以研究和弘扬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为己任。远者来说，第一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熊十力、梁漱溟、钱穆等人都曾执教于北京大学。近者而言，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主持的《儒藏》编纂工程，颇具影响。加之杜维明先生本

人现任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因此，杜维明先生的珍贵图书、藏品如能入藏北大，可谓得其所矣。此次捐赠将有益于推动北京大学乃至国内关于现代新儒家，特别是以杜维明先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的研究，以及儒家文化在中国的研究和传播，这必将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积极的贡献。



吴志攀向杜维明先生颁发捐赠证书

朱强表示，作为未来杜维明赠书的收藏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将辟专藏室收藏和保护这些藏书和其他赠品，并积极提供给读者利用。

出席仪式的还有北大图书馆馆员、高等人文研究院的教师以及杜维明先生的朋友和学生等共 40 余人。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白杨

“北京大学国子监大讲堂走进北大”暨新学期开学典礼举行

9月10日上午，“北京大学国子监大讲堂走进北大”暨2016-2017学年度第一学期开学典礼在北京大学举行。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东城区委教工委书记刘藻，北京市教委职成处副处长吴纓、副调研员陈敬文，东城区教委副主任徐建秋，东城社区学院院长张燕农、书记丁虹等领导 and 东城社区学院、东城区语言文字特色校的部分教师、社区文教助理及来自北京各区县的市民近200人参加。开学典礼由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李平原主持。



开学典礼现场

上午9时30分，开学典礼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李国平致欢迎辞，他回顾了北京大学国子监大讲堂开办的背景、现状和9年来取得的成绩，并结合北大的实际对今后如何进一步办好大讲堂作了部署，希望在北京市教委、东城区委、区政府和东城教育同仁的支持和配合下，为在首都市民中传播国学文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北京大学国子监大讲堂开办9年来，吸引了一大批市民朋友关注，凝聚了一批忠实的听众。为表彰先进，宣传终身学习的理念，本次开学典礼共评选出20位学员获得“北京大学国子监大讲堂优秀学员”荣誉称号。徐建秋介绍了优秀学员的评选过程，并宣读了优秀学员名单。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为优秀学员颁发了荣誉证书，优秀学员代表王东华作了发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更加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为了方便市民了解大课堂课程内容、名师风采等，北京大学国子监大讲堂申请了微信公众号。张燕农向学员们介绍了微信公众号的基本内容和使用方法。吴纓受邀启动了微信

公众号。随后，北大首都发展研究院发布了本学期大讲堂的课程安排。

最后，刘藻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她肯定了北京大学国子监大讲堂 9 年来取得的成绩，指出“北京大学国子监大讲堂走进北大”活动既是对北大文化传承的一次全方位的深度体验，又是增进学员对大讲堂情感的一次尝试，相信一定能够促进“教”与“学”的互动与融合，希望大讲堂不断拓展思路、创新发展，吸引更多市民朋友参加其中，推动学习型东城、学习型北京建设。



韩茂莉发言

开学典礼结束后，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韩茂莉教授以“风物——燕园景观及文化底蕴”为题，启动了北京大学国子监大讲堂 2016-2017 学年度第一学期的首场国学讲座（总第 146 讲）。

“北京大学国子监大讲堂走进北大”系列活动还包括参观北京大学校史馆和游览北大校园等。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山石

北京论坛（2016）协议书签字仪式在北京大学举行

2016 年 9 月 19 日，北京论坛（2016）协议签字仪式及筹备工作汇报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邓娅共同签署了“北京论坛（2016）协议书”。根据协议，第 13 届北京论坛——北京论

坛（2016）将于今年 11 月 4-6 日在北京举办，主题为“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互信·合作·共享”。



签约仪式

签字仪式前，林建华在副校长李岩松的陪同下会见了朴仁国总长，并与其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林建华首先对朴仁国总长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衷心感谢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为北京论坛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及对北京大学多方面的鼎力支持。林建华表示，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北京论坛已连续成功举办12届，今年将如期举办第13届，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北京论坛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外学术交流平台，成为沟通中国与世界的窗口之一。



林建华会见朴仁国总长

签字仪式后，北京论坛（2016）筹备工作汇报会举行。北京论坛秘书长严军首先从整体上对北京论坛（2016）的筹备情况作了汇报，之后经济、教育、国际关系、历史、城市规划、生态安全与生态城市、青年学生分论坛负责人，以及宣传工作、会务工作负责人依次汇报了各自的筹备情况和工作计划。

朴仁国总长对本次论坛的筹备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对几个分论坛的筹备和组织给出了建设性意见。朴仁国总长表示，本届北京论坛将会是又一届成果丰硕、令人印象深刻的盛会。

李岩松表示，北京大学有信心将第13届北京论坛举办得更成功，并希望各分论坛负责人以及各部门之间保持工作上的紧密联系，共同协作，办好本届论坛。

出席签字仪式和筹备工作汇报会的还有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淼杰、历史学系教授朱凤瀚、首都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蔡满堂、党委宣传部部长蒋朗朗、元培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孙华、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国际学术部科长金暎美等。

背景链接：

北京论坛是经中国教育部批准，由北京大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韩国高

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自 2004 年创办以来，北京论坛已成功举办 12 届，累计有近 4000 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专家学者参会，已成为世界范围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论坛之一。

北京论坛第 13 届年会——北京论坛（2016）将于今年 11 月 4-6 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互信·合作·共享”，届时将有约 300 位国内外的知名学者汇聚北京，围绕此主题深入探讨。今年论坛下设六个分论坛、一个学生论坛，分别是：

分论坛一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

分论坛二 世界文明中的巨型城市与区域协同发展

分论坛三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制度的视角

分论坛四 中国与全球治理：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的作用

分论坛五 生态安全与生态城市：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分论坛六 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角色

学生论坛 大变革时代的全球治理——世界青年的视角和声音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白杨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开课

2016 年 9 月 4 日至 9 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Justice Samuel Alito）连同乔治城大学法学院访问教授约翰·贝克（John Baker）在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PKU-STL）开设了为期一周的“美国最高法院法理与实践”研讨课。访问期间，阿利托大法官还与国际法学院全体师生以及部分校友进行了座谈和深度交流。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Justice Samuel Alito）

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院长 Philip McConnaughay 教授说：“阿利托大法官的到访给 STL 同学提供了整整一周每天与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当面交流的绝佳机会。课程围绕近期的 *RJR Nabisco, Inc. v. European Community* [579 U.S. ____ (2016)] 案展开，选课的每位同学最后都在阿利托大法官面前进行了模拟口头辩论，如同置身美国最高法院现场。这真是不同寻常的一周！非常感激阿利托大法官能为 STL 同学带来这样具有历史意义的机会。”

研究生三年级的李一丹参与了研讨课。她说：“能与阿利托大法官和贝克教授一起度过五天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当中没有人想过会有这样的机会，但是 STL 让它发生了，这是我迄今感到最荣耀和最兴奋的时刻……能在大法官面前像律师一样辩论是一种很神奇的体验。那短短的五分钟凝聚了我在 STL 的所有积累：苏格拉底教学法训练了我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全英文授课和法律写作课提高了我的语言能力；模拟法庭比赛锻炼了我的陈述和辩论能力。”

同样来自研三的朱留声感慨：“在阿利托大法官面前辩论是一场奇妙的经历。我曾经听过许多美国最高法院的庭审录音，但这是我第一次在一个大法官

面前进行法律辩论，有一瞬间我感觉我好像真的置身于美国最高法院一样。阿利托大法官的问题总是一针见血，直击法律问题的核心，这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看到了大法官们是如何思考的。我非常感激能有这样宝贵的教育机会。”

研一的胡玥在全院交流大会上向阿利托大法官进行了提问。她说：“很荣幸能够有幸亲耳听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Justice Alito 讲话甚至面对面和他交流。对我来说，能向 Justice Alito 提问并得到他友好、耐心的回答，是一次很特别的经历，对我的法律学习和职业规划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研二的秦士杰在交流会上第一个提问，他说：“能够在座无虚席的现场被挑中，在这样历史性的场合，成为第一个和阿利托大法官面对面交流的人，我感到激动不已。他对我的回应深刻而隽永，以至于他说的每一个词都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忍不住回想起过去这一年里把自己埋在成堆的美国法院判例中，一再被那些精密优美而复杂新颖的法律问题吸引，仿佛整个人生情结都焕发出来。而现在，一个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如此真实地站在我的面前，把他的人生故事娓娓道来。”

研四的禹雅典说：“如果有人告诉进入法学院前正在读《九人》的自己，有朝一日你会站在讲台前，以律师的立场向 Alito 大法官陈述一个案件，回答他提出的各种问题并得到他的认可，我肯定觉得这个人在做梦！作为即将开启职业生涯的 STL 人，我今后必将时时想起这次经历，提醒并鼓励自己：我在 STL 时就有幸在美国最高法院‘出过庭’了，还有什么压力和困难是不能克服的呢？”

研四的裴伊亮回忆说：“我们对美国法律的了解让他感到意外，我记得他用了‘very impressive’和‘incredible’来形容。他的谦逊和坦率也让我们印象深刻，他在课后和我们聊了一些与学术无关的话题，从各自的家乡到以后的职业规划，就像一位亲切的法学院前辈。”

访问期间，阿利托大法官还和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海闻教授、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院长吴云东院士，以及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的教授们进行了会面与交流。

2016 年是阿利托大法官任职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第 10 年。他由美国第 43 任总统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

Bush）提名，经美国参议院表决通过，于 2006 年 1 月 31 日正式就职。阿利托大法官此前曾任美国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美国新泽西区联邦检察官以及美国司法部官员。



塞缪尔·阿利托与选课同学合影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白杨

北京大学、芝加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合作签约仪式举行

2016年8月30日上午，“迈向新时代的社会工作——北京大学、芝加哥大学及香港理工大学合作签约仪式”在北京大学陈守仁国际研究中心举行。

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香港理工大学副校长阮曾媛琪、芝加哥大学社会服务管理学院院长 Neil B. Guterman 等三校代表，包陪庆基金会会长包陪庆女士、包女士之子苏文骏先生和静瞳投资创始人彭粟女士，以及多位在京社会工作实习导师和国内中西部地区各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青年学者出席了仪式，并就中国社会工作如何应对社会变迁带来的挑战和问题这一学术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李岩松在致辞中表示，本次签约是三校合作的起步，标志着以北京大学社会工作教育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将进入一个以社会问题干预为目标，以社会政策实验为导向，国际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和中国社会变迁具体情境有机结合的新时期。

三校合作的主要捐资人包陪庆女士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正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在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中，需要大量优秀的社会工作者，大学应承担起培养懂理论、敢实践的社会工作人才的重任，引导更多的年轻人去解决社会问题。此次

三所高校在社会工作方面开展的合作正是其多年来的梦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代表向包陪庆和彭粟献上了鲜花。

在来宾的见证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张静教授、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系主任黎永亮教授和芝加哥大学社会服务管理学院院长 Neil B. Guterman 教授共同签署了合作协议。



签署合作协议

协议签署后，嘉宾为北京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校外导师和督导颁发了聘任证书，聘任仪式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马凤芝教授主持，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宋文珍作为受聘导师代表致辞。



校外导师聘任仪式

最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思斌教授主持了以“社会变迁与中国社会工作”为主题的研讨会。研讨会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熊跃根教授、新疆大学付再学副教授、西安市社会科学院杨晖研究员、云南大学高万红教授和西南石油大学谭祖雪教授分

别以所从事领域的社会工作议题进行主题演讲。

此次合作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芝加哥大学社会服务管理学院、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在社会工作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等领域进行合作的开始。三方将以此次协议签署为契机，加强中国社会工作与国际社会工作的交流与合作，并将致力于培养具备社会学专业素养的高素质社会工作人才，推动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与进步。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江南

网教之声

中国 MOOC 该如何发展

中国 MOOC 的 4 年实践, 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 又有哪些问题需要反思? 从研讨会上几位专家学者的发言中, 可以理出一个脉络。

不能只注重形式翻转要重内涵

陕西师范大学傅钢善教授是国家级名师, 他主持的《现代教育技术》是学校首批信息化示范课建设的 MOOC 课程。2016 年, 这门课程在中国大学 MOOC 上线以后, 颇受欢迎, 到 4 月 25 日, 注册人次已达 5943 人。

傅钢善强调, MOOC 课程建设和以往的课程建设目的不同。MOOC 课程是要帮助学习者构建两个网络, 一个是学习者自身的知识网络, 另一个是学习共同体的社会网络。只有把握住这两点, 才能使课程更加有效。

他说, 优秀的 MOOC 课程包括优质学习资源、讨论交流环节、效果检验与测评三大环节。优质学习资源则由教材、微课教学视频、学生学习 PPT、拓展资源四大部分组成。

《现代教育技术》曾获得陕西省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也是国家级教师教育精品资源共享课。但为开展 MOOC 课程建设, 课程团队推翻原教材, 按照四大模块重新组织。课堂视频也没有套用原有的课堂切片, 而是重新设计了一套微课。这就使学习思路更加清晰, 更利于学生掌握。

“我们的课程绝对是领先的、引领的、有特色的, 因为我们有着丰富的资源。我们绝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把资源一放了之, 那样必定失败。”傅钢善说。

现在, 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领域都在广泛进行翻转课堂实验。陕西师范大学教师专业能力发展中心副主任何聚厚, 以自己的亲身实践谈到了对翻转课堂的思考。

他认为, 当前很多翻转课堂注重的是形式的翻转, 而没有注重其内涵。“我们要搞清楚翻转课堂要达到怎样的目的。一个班级的学生, 智力水平、学习

习惯是不一样的，翻转课堂就是要解决学生学习能力的差异性问题的。”

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对教学进行重构，因此，翻转课堂能否成功取决于教学设计，基于课程特点和学科特点设计每一次活动非常关键。要通过内容重构，实现课前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引导学生积极思考；课堂促进师生与生生的互动以及问题解决；课后实现知识迁移。

在总结经验的同时，专家们还就一些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发表了看法。

据统计，国内大学以各种方式建设的MOOC平台已有40余个。傅钢善表示，MOOC课程不需要在那么多的平台上运行，网络无边界，不需要各家都建一个。一个平台后面一定要有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服务团队，这是一个平台存在的价值和未来有没有发展空间的保障。

现有的MOOC课程多由著名大学提供，那么，一般大学是不是也要做MOOC，以体现本校的特色？华南师范大学教授焦建利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说：“MOOC发端于一流大学，但不是一流大学的专利。任何大学都可以在MOOC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定位，而且也必须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定位。因为MOOC不能取代大学，

但是用MOOC的大学可以淘汰不用MOOC的大学。”

一直以来，高辍学率被认为是MOOC最突出的问题，但在专家们看来，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缠。

傅钢善说：“我们平时到商场里去，都是东家看、西家看，不见得一定要买东西。MOOC也是如此，它是资源的全开放，人们去浏览，去欣赏，是完全可以的，为什么一定要获得学分认证呢？更重要的是，MOOC应该在终身教育体系构建和学习型社会建设中发挥作用。”

我们是否正在背离MOOC的初衷？

“MOOC在中国的发展正在背离MOOC的初衷。”焦建利认为，MOOC和传统课程最大的区别在于，MOOC学习完全是自愿的，是一种非正式学习方式，把它整合进功利性的正式学习之中后，就会引发出许多问题。“一切的根源来自于功利的因素。如果一定要让MOOC在正式学习中发挥作用，就要用99%的精力去进行教学设计，使课程多样化，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

陕西师范大学研究员张举范认为，当前，应该更多关注MOOC的网络学习特性。与传统的课程、教学和学习相比，

网络课程和学习不仅仅包含着教学方式的根本变化，其背后更多的还隐藏着基于信息技术生存环境下的传统教学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的重建。

焦建利表示，在 MOOC 时代，当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向任何人学习想要学习的几乎任何东西的时候，我们就需

要重新思考，我们的学校究竟起什么作用，我们应该怎样来设计我们的学校。

来源：在线学习

记者：刘增辉

编辑：丁香耳朵

陕师大观念超前 教师在线教育先行一步

刚刚上线的陕西省高等教育 MOOC 中心平台，是一个专注于教师教育发展的平台。它将扎根西部，整合全省教师教育优质在线课程资源，向陕西师范院校和中小学开放，推动全省教师教育和基础教育的创新发展。

“一把手”工程推动先行一步

MOOC 中心平台落户陕西师范大学，可谓实至名归。陕西师范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大学，是西北地区教师的摇篮，具有悠久的办学历史和雄厚的办学实力，是国家培养高等院校、中等院校师资和教育管理干部，以及其他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基地。

陕西师范大学的远程和继续教育也主要面向教师进行继续教育，服务于教师专业成长。学校从 2002 年开展现代远程教育以来，在很多方面都进行了积极

的探索。学校整合了校内教学资源，建立了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教师教育与基础教育融合的发展模式，形成了网络教育与传统教育相互融通，资源开发应用与人才培养相互融通的办学新格局。

特别是，早在 2012 年 MOOC 风暴初起之时，陕西师范大学就在国家级精品课程建设的基础上，试点了校内 MOOC 课程建设，并出台《陕西师范大学信息化教学 2013-2020 行动计划》，把信息化教学作为学校“一把手”工程开展，这在当时的高校中是不多见的。

2014 年 1 月 10 日，学校在全省第一个向教育厅提交了成立 MOOC 中心的报告。2015 年，学校成立了以党怀兴副校长牵头的 MOOC 中心筹备组及专家委员会。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学校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建成了 MOOC 中心在线开

放课程平台——积学堂，并通过了教育厅组织的专家验收。

“积学堂是专注教师专业发展的网络课堂，这是教育厅对我们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要求。”薛东前介绍说，积学堂可为陕西省高等教育 MOOC 共建、共享体系提供全面技术支撑。目前，已经搭建完成的课程平台先进、成熟，具有开放性和标准化、可拓展性和易升级性、可管理性和实用性等特点，能够灵活支持 MOOC、SPOC 等多种教学形式，支持移动学习、社交化学习，任何校内外教师、学生都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浏览学习内容、获取资源、评估教学效果、实现彼此的协作学习。平台还能够进行大数据分析，学校可通过数据分析发现问题，提出解决策略。

截止 2016 年 4 月，积学堂已上线 100 多门教师教育课程，涵盖教育学、心理学、教育技术、文学、历史、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新观念指导多方面探索

薛东前表示，“MOOC 和教育教学模式创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MOOC 不仅仅是一种资源，更多的是教学观念和理念的变革。因此，我们将展开多方面的探索。”

在教育教学模式上，将重构传统的教学方式，形成社会化自组织式教学模式。包括重构课程内容体系，采用基于知识点的课程视频组织方式；课程过程中穿插互动式的提问、测验、讨论等活动，促进学生深度学习；提供完整的教学支持服务，实现学习过程数据全纪录，学习数据的系统化、可视化。

在评价方式、方法上，将采用多元评价，全面考量学生学习效果。包括在每个知识点视频中穿插互动测试环节，即时监控与反馈学生学习情况；每节课程设计作业环节，作业中提供完备评价标准，通过小组互评促进自我反思；每门课程设计期末测验，学生通过自评考核知识掌握水平。

作为教师专业发展的平台，为教师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是积学堂重要的考量。它可为教师包括学生建设个人的网络课堂，形成个人终身教学、学习的网络空间。通过 MOOC，教师与专家组成共同体，共同学习、提高。扩大平台功能，与全国权威机构实现连接，使教师能力得到更大提升，比如符合条件的教师可纳入“全国名师发展计划”。将教师培训、课程学习、学历教育紧密结合，探索交互学习和学分互认的新机制，利用

碎片化时间学习积学堂课程获得结业证书。可实现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

积学堂还有更大的规划。它将推动学分银行建设，与兄弟院校合作，真正实现跨校学分互认；开展大数据挖掘与应用探索，将教学过程与教育教学改革同步。更重要的，要成立 UGS 教师教育联盟。

“U 是大学，G 是政府，S 是学校。MOOC 是开放共享的，没有一个共同体，资源共建共享就落不到实处。UGS 将为中小学翻转课堂教学、创客教育、卓越

教师培养等目标服务。”薛东前强调，这是一个面向全国联盟，将包括若干所高水平师范大学、100 所全国知名中小学和 20 个地区的地方政府。

作者：刘增辉

来源：《在线学习》杂志

■ 北大人物

苏勉曾：勉运家国 增臻学术

编者按：“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君子治学处事，立志高远却又基础扎实，胸襟开阔更能兼察微理。北大老前辈们用自己的人生为这种君子之风做了很好的诠释。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离退休工作部启动了“君子志道”专题访谈活动，走访了一批离退休老同志。

在这些交织着历史沧桑和个人生活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在历史长河中北大人默默担当的身影，感受到了北大人浓郁沉淀的家国情怀，体会到了北大精神的深厚源长。本期“君子志道”访谈专题，将带我们一起走进北大老前辈们的朴实与精彩。

清晨的阳光透过落地窗洒了进来，斑驳的阴影投射在玻璃茶几上。茶几下是一摞摞报纸、杂志，摆放得整整齐齐，凑近一看，有《炎黄春秋》《南方周末》等。茶几旁边，九十岁高龄的苏勉曾先生半佝偻着身躯坐在藤椅上，双腿上摊开着一份今早刚到的报纸，他左手微微架着眼镜，右手指在报纸上缓慢地滑动，

阳光把他的影子投射到地上，勾成了一幅剪影画。

烽火连城兮，求学漫征程

幼年时，苏勉曾的家乡河南时局一度十分紧张，先有军阀混战，后有日军来袭，一直到“九一八事变”前夕，时年七岁的苏勉曾才背上书包正式步入学堂，从此开始了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征程。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人从河北一路烧杀抢掠，很快攻到河南。此时，刚在开封上中学的苏勉曾不得不随学校转移到河南东南位于大别山区的商城县，不久，又迁至河南西南的偏远小城——镇平县。乱世中，苏勉曾身如浮萍的状态直到学校迁到伏牛山窝里的内乡县夏馆镇才算结束。“我们当时年纪都很小，身板也瘦弱，没有汽车、火车，只能背着小行李，一天步行五六十里路赶到一个又一个安置点。日子很苦，但是没办法，国难当头，我们无家可归，

只能与学校共命运。”回忆起那段颠沛流离的岁月，苏勉曾长长叹了一口气。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逃难中的求学生涯，特别是开封高中三年的学习生涯对苏勉曾有着延续一生的影响。当时开封高中的老师多数是北大毕业的，学校也因之有了一些似北大那般的民主风气、自由思想和学术氛围，允许学生成立各种各样的社团，让苏勉曾印象深刻的有社会科学读书社、文艺社、剧艺社等。当时社团的很多活动多是由地下党直接领导，老师们还经常为学生讲解时政、分析时局。耳濡目染内忧外患的家国现状，苏勉曾与同学们的思想受到了触动，爱国热情更加浓烈了。这也促使他在1943年高中毕业时，与他在读书社结识的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们决定结伴离开国民党统治森严的河南，前往昆明的西南联大，追寻进步思想。

可是，决定容易，旅途却不平坦。苏勉曾先是一个人走“西安—宝鸡”线到重庆参加了入学考试，在被联大录取后，他便马不停蹄地要赶往昆明。但是在战火连天的岁月里，远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当时什么办法都试了，坐过运货的‘黄鱼车’，也壮胆上过国民党军车的篷顶，一心只想往联大奔！”而时局对这群稚气未脱的年轻人来说确

实有些前程未卜的味道。为了心中涌动的联大梦，苏勉曾甚至在鬼门关里头绕了一回。为尽快到达昆明，他取道贵州。无奈沿途道路崎岖，多悬崖峭壁，在离贵阳还有二百里地的息烽发生了车祸，苏勉曾被重力甩出，晕死在灌木丛中，后幸得被及时救出，在贵阳休养了一个月才清醒过来。凭着对联大的无限向往和追求进步、不怕困难的韧劲闯劲，经过长途跋涉，他最终于1943年底到达昆明西南联大。“以前我常和我的一些学生说，你们千方百计费很大的劲考托福去美国，我们那时向往西南联大的那个劲头可一点不比你们差。”苏勉曾笑道。

联大共国运，书生奋激昂

1943年，19岁的苏勉曾正式成为西南联大的学生，就读于化学系，开始了他与化学一生的不解情缘。联大学生们属于“公费”读书，国家给沦陷区学生贷金，保障基本生活费和伙食费。即便如此，物资供应仍然十分紧张。在一间间破旧的茅草房、土坯房里，这些从全国各地聚集到联大的莘莘学子们一面挑灯夜读、精进学术，一面又不得不“兼差”打工，以维持学业不辍。苏勉曾想起当时同窗们“各谋生路的绝招”：有去做家庭教师的，有在云南报馆做校对

员的，有在影院当引导员的。苏勉曾自己也做了两份“兼职”：教人英文和在学生浴室里当服务生供水。

当时的西南联大虽然偏居西南，但它始终站在中国社会革命的前沿。即使在这种“半工半读”的艰难条件下，联大的同学也没有忘记关注国家命运。“当时联大有一面专门贴大字报的墙，很多人在上面发表观点，颇有百家争鸣的感觉。”苏勉曾追忆说。大字报多表现进步思想，从对战争形势的看法到对社会局势的评判，不一而足。那个时候，联大社会学系、政治学系的教授们经常出来演讲，文科系、法学系的教授们也总是侃侃而谈。学生们往往席地而坐，聆听教诲。受进步思想的影响，苏勉曾参加了历次学生运动。但他笑称自己那时候觉悟不高，“运动过后，我就又回到图书馆苦学去了”。



苏勉曾个人照

1945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迁回北平。苏勉曾选择到北大。“我当时的想法很单纯，就是流浪了八年，终于可以安定下来好好读书、搞研究了”，正是这种单纯的“我为学术狂”的精神，让苏勉曾得以与北大结缘。

然而，抗日的胜利并没有带来和平。1945年，中国又陷入了内战。当时的北大秉持五四精神，民主气氛浓厚。师生们经常参加反国民党独裁、争取社会民主的运动。他们热切企盼全国的和平，不但抵制国民党政府南迁北大，一些进步学生还偷偷地跑到解放区参加共产党搞革命。受解放战争胜利的鼓舞和学运高涨氛围的影响，苏勉曾于1948年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文化工作者联盟，积极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动员师生、北大附近居民迎接解放。1949年北平解放，党组织要吸纳培养新成员，苏勉曾被吸收参加党员培训班，并于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苏勉曾看来，如同他加入共产党是自然而然的过程，留校任教也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选择。解放战争进行得最激烈的时期，也是苏勉曾在实验室做毕业论文的时候。当时，他跟着化学系的主任钱思亮教授做有关杀菌剂（苯环）的毕业论文，研究目的是使杀菌能力变

强、毒性变弱。这个实验要求对氯代苯酚上的第 6 个位子做很复杂的合成实验，但是受当时条件限制，许多化学试剂都要靠自己去找。为了做好实验，苏勉曾只能尝试从裂解蓖麻油里取得几种直链醇。他日复一日地埋头苦干，在高温真空裂解下分离不同的碳链醇，再接到苯环的第 6 个位置上。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后，他成功了。1948 年，正值北大 50 周年校庆，学校准备举办一场学术报告会，要求每个理科院系出一篇论文参会，苏勉曾获得了导师的推荐。后来，他又在中国化学年会上作报告，这是他在化学领域暂露头角的时刻。

沉浮几年岁，矢志为学问

1949 年 2 月北平解放，北大迎来一片新气象。随后，“破旧立新”“三反”“五反”等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为向科学方向发展，北京各大高校根据实际发展需要进行了院系调整。但是好景不长，随着 1957 年“反右”运动的扩大化，极“左”路线指导下的各种政治运动便接踵而至了。

1963 年北大开始搞社会教育运动，师生被陆续派到各地农村。苏勉曾也被分配到四川峨边县的一个山区公社，带了一个工作队，共十几个同学参加运动。

每个同学被分到相应的一个生产队去做领导，访贫问苦、搞扎根串联、组织阶级队伍、指导生产。当时苏勉曾对上头的做法比较怀疑和排斥，因为实际体验让他觉得农村干部多数很好，并不存在“四不清”问题。所以，他时常告诫他的学生要尊重当地党支书、村长，切不可高高在上乱指挥。

不久后，苏勉曾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化学研究所进修。1965 年他从苏联进修回来，回国后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文革中苏勉曾也曾几度沉浮：先是挨批斗，闭门读毛选；后被派到北京化工厂思想改造，和厂里的工人搞技术革新；最后被下放到江西南昌的鲤鱼洲农场改造。文革的压抑气氛使苏勉曾深深意识到这种“斗、批、改”的风气是违背国家传统和世界文明的。在被下放改造的过程中他始终不忘克服艰难条件，刻苦钻研，积累经验。他有着“看天上云卷云舒，观庭前花开花落”的平和心态，坦言如果生不逢时，多吃些苦、受些罪、经历些挫折，对一个人的成长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不管是奔波几千里去上学，还是下乡劳动，又或者是被批斗，苏勉曾既不怨天尤人，也不畏难退缩。回忆起这些往事时，九十岁高龄的他，眼里

透出的不是惋惜，也不是遗憾，而是历经沧桑沉浮后的恬淡与释然。

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苏勉曾的学术研究也迈向一个新台阶。文革后的中国百废待兴，了解到固体化学这个新兴的交叉学科对国家发展意义重大，苏勉曾就决定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事实上，当时不仅在中国，即使在全世界，固体化学都是一门很新的方向。上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才有人系统研究固体化学，理论上仍存在着诸多困难；而研究固体化学需要的高端探测仪器，在国内也很稀缺。苏勉曾不仅要克服实验条件简陋的困难，自己制造设备，还要不断参考国外最新思想动态，进行多学科的交叉讨论，特别是和物理系光学、磁学的教授探讨。固体反应条件通常比较苛刻，90年代初期，他率先将国际上的“软化学合成”方法引入国内并加以发展，在温和的条件下，实现了发光材料、径向梯度折射率玻璃等多种无机功能材料的可控制备。

就这样，通过一点一滴的努力，苏勉曾不仅成了将固体化学引入国内的第一人，而且为这门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倡议在中国化学会内成立固体化学专业组，由北大化学系牵头组织

或协办的全国固体化学学术会议达十余次；同时，北大举办了两次固体化学研讨班，邀请国内同行来座谈，作了多场学术报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苏勉曾（左）与同事合影

改革开放后至他正式退休前的二十多年里，苏勉曾始终兢兢业业，将宝贵的时间献给了他钟爱的化学实验室。他先后培养了二十二位硕士、十一位博士，发表了一百五十多篇研究论文，出版了三部专著、两部译著。在用于三基色荧光灯的蓝色荧光粉、超细稀土-过渡金属合金、永磁材料和X射线储蓄发光材料的制备方面，申报了四项国家专利。在社会服务工作中，他担任过中国化学会理事、中国物理学会发光分会常务理事等职，担任过《化学通报》《中国科学》等10种学报的副主编、常务编委或编委。

此外，苏勉曾系统研究过稀土氯化物、碱土金属氯化物及二者之间的熔盐

相图，确定了稀土氯化物水合物脱水 and 气相水解反应的机理，为我国稀土化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苏先生当之无愧是我国固体化学，特别是稀土功能材料领域德高望重的领军科学家！”现中国科学院院士、北大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严纯华不无敬佩地说。

学者范长存，耄耋情依旧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一生秉持“科学救国论”的苏勉曾对于学术和研究的热爱超乎了常人的想象。“老爷子到八十多岁还在带研究生，天天往实验室里跑。”谈到“学术狂”的父亲，苏勉曾的女儿笑道。

在苏勉曾的学生眼中，他从来都是个“行胜于言”的学者。苏勉曾有着学者严谨踏实的作风，做学术、做人都在力求一丝不苟，对自己的要求甚至近乎苛刻。他给学生们讲授固体化学时，使用的每张投影片均为手写，字体优美、图片规整，常为学生们所惊叹。每当研究遇到困难时，他也总是亲自带学生查找资料、讨论问题，寻求各种解决途径。他的实验技能高超，遇到难度大的实验，学生们不知所措时，他就亲自动手。据他的学生、北大化学系教授荆西平回忆，有一个测试氯气分压的玻璃装置就是苏

勉曾自己吹制的。即便是退休后，但凡有学生当面或者电话咨询问题时，他也总是能够娓娓道来，使人茅塞顿开。“先生的谦逊和博学是渐渐成人的我所愈发体会到的特质。”严纯华感慨道。

苏勉曾对学生的要求也很高，他总是教导学生们要把实验室收拾干净，把各种仪器设备准备好，再静下心来，认真思考当日要做的事，安排好工作程序，无论大事小事都要一丝不苟地做到位。

“先生的这种品质和精神，已经深深地影响了课题组的同学们。因此，我们这个课题组出来的同学，都好像带上了这样的印记。”苏勉曾的学生、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在回复记者的邮件采访时这样写道。

退休后的苏勉曾除了依旧关心固体化学学科的发展外，也重拾了自己年轻时候的爱好。他喜欢看书，但凡社科类、文学类的均有涉猎；兴致来的时候也喜欢唱两首。“老头年轻时候是合唱团的团员，退休后也一直在北大教授合唱团呢。”苏勉曾的女儿说。除了看书、唱歌，苏勉曾还喜欢照相和滑冰。“我的生活可不是只有化学的，但是本质上讲我还是最喜欢化学。”他“狡黠”地笑了笑。

说到自己工作了一辈子的北大，苏勉曾有点激动。他说自己很喜欢北大，以作为北大人而自豪。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是他所推崇的。“我在学校搞什么研究，开什么课，带什么样的研究生都是我自己决定的，很自在。”

当记者要求他为年轻的学生写一段寄语时，他笑道：“谈不上什么寄语与殷切期盼，我想和年轻学生分享的无非是研究学术数十载的心得，那便是甘于寂寞，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不要弄虚作假，急功近利。如果能将个人兴趣与未来发展同国家社会的需求充分结合起来，学有所用，那就更好了。”

苏勉曾的一生虽然历经战乱和政治运动，但他始终以豁达乐观的心态，勉励自己，将个人命运系于家国。他对学术和科研的热爱是浸透到骨子里的，他视所有的艰难困苦为“曾益其所不能”的宝贵食粮，也因为如此，他攻克了一

个又一个的难关，并最终攀上了学术的高峰。（文/离退休工作部学生记者龚玉婷）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王颖霞、卢英先、王菲等老师在核对本文专业知识方面给予了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白杨

汪劲武：草木为业 学术为乐

编者按：“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君子治学处事，立志高远却又基础扎实，胸襟开阔更能兼察微理。北大老前辈们用自己的人生为这种君子之风做了很好的诠释。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离退休工作部启动了“君

子志道”专题访谈活动，走访了一批离退休老同志。

在这些交织着历史沧桑和个人生活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在历史长河中北大人默默担当的身影，感受到了北大人浓郁沉淀的家国情怀，体会到了北大精

神的深厚源长。本期“君子志道”访谈专题，将带我们一起走进北大老前辈们的朴实与精彩。

采访约在生命科学学院一楼大厅，离约定时间还有十多分钟，汪老就到了。他骑着一辆自行车，体型略显消瘦，头戴一顶深蓝色的棒球帽，帽子边上露出黑白夹杂的头发，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在圆形无框眼镜四周晕开一圈圈笑纹。他语速不快，思维却清晰，对每一个问题都认真回答。



汪劲武整理植物标本

持志

汪劲武从小就对植物感兴趣。“我有‘植物情结’，自小就喜欢植物，动物却是不太喜欢的。”1937年，日本大举侵华，为躲避战火，汪劲武一家逃难到桂林附近的山里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发现山上有好些花开得灿烂自己却不认识，这让他感到遗憾：“当时

特别想好好地了解一下。”因此，1950年他选择报考清华大学的生物学系。

像那个年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汪劲武的求学道路一波三折。他在清华大学只学习了一年，就转到了北京大学的植物学系，学习自己喜欢的植物学专业。年轻的他在面对择校的选择时有过犹豫，是留在清华改学动物学，还是到北大继续学习植物学？这时候，有同学对他说：“你喜欢植物学是一辈子的事情，你喜欢什么东西搞一辈子才能有成就。”这句话坚定了汪劲武的选择，他便转到北大继续攻读植物学。如今，八十八岁的汪劲武回忆起同学当年的话感触更深：“人要做什么事，一定要专心，不要三心二意，人生就是几十年，要有点成就，认定了一个方面，就坚持搞下去，时不我待。”

来到北大后不久，汪劲武遇到了一件让他既兴奋又羞愧又激发他斗志的事。那是1952年的春天，中央林业部到北大选调了一批植物学系的学生到海南岛、雷州半岛调查野外植物，为栽种橡胶树作准备。对于喜欢植物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能够实地观察植物的机会。汪劲武便兴冲冲地去了，不料现实却给了他一个下马威：身为植物学系的学生，除了少数几种植物之外，他竟然

不认识其他植物！尽管同行的人也面临着一样的问题，但这件事情还是让他觉得羞愧。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他想了各种办法，最终决定先采集植物标本，有机会再找专家鉴别。不曾想，自此，这个习惯便延续了几十年，汪劲武一生采集了许多植物标本，这些都是他津津乐道的“大宝贝”。

雷州半岛的经历迫使汪劲武正视自己的植物学素养。1952年，回到学校之后的那个暑假，他没有回家，而是抓紧时间请老师指导，把校园的植物清清楚楚地认识了一番。他在校园各处走走看看，走过朗润园，也走过未名湖，他常常走着走着，就停下来，伸手抚过一朵花细细端详。暑假结束后，汪劲武在植物学方面有了不少的积累，认识的植物也越来越多。

但汪劲武仍然觉得不够，好在大四两个学期植物分类学的专业课程终于给他提供了扎实学习的机会。当时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老专家轮流来讲课，汪劲武听得很认真，他几乎把每一句话都记了下来，五六本厚厚的笔记本满满的都是字。其实这门课是相当枯燥的，背诵不易，考试难过，但汪劲武居然也听出了乐趣。他做了一堆小卡片，正面写上某种植物科，背面写上这科植物的特点，

写完之后用皮筋把卡片一扎，放到贴身的口袋里，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开会前掏出来看看，吃饭时拿出来背背。无事的时候他也不闲着，延续了暑假实地考察的习惯，到园子里各处溜达，把实物和知识点比对，“交互促进”。有些同学觉得他学得有点傻了，他倒是不以为意，仍然乐在其中，“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花费精力，是最值得高兴的事情”。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样的学习终于使得他对植物有了更多的认识，不仅以优等的成绩轻松通过考试，也得到了老师的高度评价。汪劲武的四年也过得非常充实，他不断从课本中或实地调查中积累植物分类学的知识，越学越有滋味，越学越感兴趣。

执教

1954年，汪劲武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以北大教师的身份继续从事植物分类学的研究。

当时植物学专业植物分类学非常缺人，留校不久，汪劲武就必须上台讲课。与他对植物学的痴迷不同，许多同学认为这门学科是需要死记硬背的，比较枯燥乏味。“但是这个学科是有它的实际用处的，而且是个基础科学，必须学。

我得能解决同学的兴趣问题，至少要让听得进去。”所以怎么才能让学生上课不打瞌睡，将枯燥的植物分类学讲得有趣味一直是汪劲武研究的问题。

他想到一个办法——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中国的文化从《诗经》《离骚》到唐诗宋词到元曲明清小说，都有植物。他觉得困惑：“古人为什么把植物写得那么美，你们却不感兴趣呢？”他便去阅读和搜集与植物有关的文学作品，无论是经典文本，像《诗经》《本草纲目》等，还是当下的散文著作，像朱自清的《看花》等，他甚至去搜集了很多与植物有关的民间故事……总之，只要是和植物相关的，能够和植物的形态、历史、文学属性扯得上关系的，他都拿来仔细阅读。

他将植物分类学课程与这些故事结合起来，拒绝机械地教授植物学，而是把植物学知识和植物背后的奇闻逸事都教给学生，让他们也知晓大自然植物真正的美——“专门搞植物的又怎么可以机械地学习植物学呢？”

他的教学方式改变后，同学们的兴趣也提高了不少。他在课堂上经常讲些有趣的小故事，采访过程中，汪劲武信手拈来。比如“香椿臭椿”的故事说的是古代有一个皇帝到农村微服私访，农

民准备了香椿炒鸡蛋招待他，皇帝觉得非常美味，便下旨要封香椿树为“树王”，写好“树王”的牌匾后，他想亲手挂到香椿树上去，可惜他并不认识香椿树，最终把牌子挂到了臭椿树上，香椿树非常生气、伤心，以致于皮都裂开了。于是，同学们都记住了“香椿树树皮是裂开的”这一特征。2009年，汪劲武参加1959级学生们的聚会，一进门就有同学找他说：“老师，您还记得您讲的香椿树的故事吗？我们至今还记得呢！”说到这里，汪劲武忍不住笑了。

汪劲武其实也知道，无论他再怎么努力，植物分类学的知识对一些同学还是过于枯燥了，他并不要求学生们都能成为植物分类学的专家。但他认为，作为老师，让同学听进去、有所收获是他的本分。

1992年退休之后，汪劲武仍然带着学生到野外实习，近则在门头沟东灵山、河北雾灵山、塞罕坝，远则在山东昆崙山。“和学生们在一起很开心，我喜欢和他们交流。”有同学回忆了汪劲武带着他们去东灵山实习时发生的小故事。当时汪劲武因为眼镜摔坏无奈暂时脱离了大部队，可是当大家已经在前面走了半个上午，累得四仰八叉的时候，转过头来才发现本该“相隔万里”的汪劲武

就在身后不远处。虽然腿上还捆着厚重的绑腿,手里拄着拐杖,但汪劲武仍然迈着稳稳当当的步子渐渐向他们靠近,不一会儿就跟上了大部队。能跟随汪劲武去实习是不少学生引以为豪的事情,有同学撰文道:“我们若是碰到错过了汪先生的人,作为‘过来人’的我们就会对他表现出无比的同情——这样,汪爷爷就愈加成了有点传奇色彩的人。”



汪劲武为同学们讲解植物学知识

很多同学都喜欢汪劲武,亲切地叫他“神仙爷爷”,课堂上的“神仙爷爷”讲着香椿臭椿的故事把大家逗得哄堂大笑;校园里的“神仙爷爷”手拿植物,用带着轻微湖南口音的温柔嗓音向围在身边的一大帮孩子细细讲述茎叶上细微的特征;野外的“神仙爷爷”步伐矫健,为身后一串带着草帽气喘吁吁的弟子开

山开路——当“神仙爷爷”的学生真是一件高兴的事情。


退休后,汪劲武没有休息,他接受了帮助学院整理植物标本室的工作。现在的他仍然笔耕不辍,有时写文章写到晚上十一二点,一上床就睡着了。他对自己现在的生活都非常满意,这让他看起来非常年轻,脸上除了笑纹,很少有其他皱纹。

直到现在,汪劲武还是会时不时骑着自行车到未名湖边看看,虽然绝大多数植物他都认识,但是他想查看下是否有新栽种的“意外之喜”。植物之外,汪劲武还喜欢哼歌,有时会哼两句《小河淌水》或者《康定情歌》。聊到此处,汪劲武便哼了几句喜欢的歌,十分有趣。

科普

汪劲武一生致力于植物科普。他在1964年出版了第一本植物分类科普书《树木花草的识别》。无论是写植物科普小品文还是写书,他总是特别注意根据实际情况加上关于植物的故事和典故,在文字上也尽量生动有趣。

比如在《中国樱花趣闻多》中,汪劲武引用刘禹锡的“樱花千万枝,照耀如雪天”,元稹的“花砖曾立摘花人,窄破罗裙红似火”,方回的“浅浅红开



料峭风，苦无妖色画难工。十分不肯精神露，留与他时著子红”，来分别说明樱桃雪白、深红、淡红的颜色特点。他引用唐代诗人王维《敕赐百官樱桃》中的“芙蓉阙下会有千官，紫禁珠纓出上阑”来说明樱桃的珍贵；还在文章中提到了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里讲述的一个故事，以此表现樱桃在古代还可以作为青年男女相爱的信物。明明是科普文，却不显得刻板可厌，行文明快如流水，诗意流淌其间，读来口角噙香、回味无穷。把各种相关诗句信手拈来化入文章中，在电脑搜索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并不算难事，但是汪劲武的引用却全靠自己的积累和记忆，且引用得如此妥当、贴切，十分不易。

植物分类学家王文采院士对汪劲武的小品文这样评价：“内容短小精悍，文笔生动，是脍炙人口的植物学普及作品。”

汪劲武研究的“种子植物分类学”在生物学领域中比较偏门，在日常生活价值却不小。有一次，汪劲武路过五道口城铁西边时，遇见一个在露天广场卖中药的小贩，他声称自己所卖的“壮阳果”来自西藏，作用极好，当然价格也不低，汪劲武立即判断出小贩说的是

假话，因为藏药志里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

不仅如此，学习植物分类学对于中医的传承发展也有作用。汪劲武曾听人说现在有的中医既不认得药用植物也不会看病，在汪劲武看来，这样是不行的。汪劲武希望能再多写些科普文章。“我现在写科普文章，有使不完的劲，也想做很多事情，人生在世太短暂了，要留下一些有意义的东西。”

科普是发展植物分类学的好方法之一。汪劲武认为，科普工作的重点就是让普通人能看懂、看得进去，学到正确的、有益的知识，但他深切地感受到科学地普及植物分类学知识刻不容缓。现在市面上的有些科普书，连“油橄榄”与“青橄榄”、“红柳”与“杨柳”都混为一谈。一遇到这种情况，他就会毫不留情地指出来。

近年来，他编写了《怎样识别植物》《种子植物分类学》《常见野花》《植物世界拾奇》《少年趣味植物学》等十多部科普著作和数以百计的科普小品。他的作品被许多喜欢植物学的朋友阅读、推荐，2010年出版的《植物的识别》在次年被评选为“大众最喜爱的图书之一”，在2012年从一千多部参选作品中

脱颖而出，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授予“全国科普图书优秀奖”。

汪劲武喜欢植物分类学，就搞了一辈子植物分类学；喜欢科普，现在仍然在写科普书。采访时，他不爱谈自己的成就，只是一再强调他只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一位学生在拜访完汪劲武后这样写道：“望着已经八十多岁的汪先生，心里丝毫不会生出艰辛、坎坷或者寂寞的感觉，你甚至也没法给他套上‘坚韧’这样的形容词。‘做你感兴趣的’也许就是诀窍。”

采访即将结束，他突然对记者说：“我对年轻人有一个希望，那就是要有一个目标，坚持下来，千万别三心二意。”

勤奋和坚持，这些词没有一个带有天才的光环，却是汪劲武始终坚持的品质。他是一个坚持了自己梦想的实干家，是一个替学生着想的“神仙爷爷”，是一个喜欢较真的严谨学者。（文/离退休工作部学生记者 郑建莉、缪亚敏）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白杨



汪劲武参加学生社团活动后与学生合影

学者谈读书

贺桂梅：人书岁月

编者按

书和人，是我们大学生活中最重要的两样，书是打开世界的大门，而人构成生活的主体，它们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不仅拓宽我们的眼界，更是增加人生的厚度。本期我们专访当代文学教研室的贺桂梅老师，听她来讲一讲北大求学生涯中影响过她的那些书和那群人。



岁月·书籍

谈起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一本书，贺老师认为不能一概而论，这要因时而异。

高中时期的贺老师喜欢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那时虽然承受着很大的学业压力，但是身为一个“文青”，她还是怀有对文学的热爱。

《约翰·克里斯朵夫》作为一部成长小说，曾让她青春期复杂混乱的想法得到一些安慰，并将之“秩序化”。

本科时期，贺老师最喜欢的书是存在主义理论家和文学家加缪的随笔《置身于阳光与苦难之间》。存在主义理论认为人是没有本质的，成为一个英雄还是一个庸人，都是自己的选择。这点对于当时的贺老师很有“励志”作用。她是在北大课堂上听到了关于存在主义的理论，读罢便很欣赏，因为它强调人的主体性，人不受任何约束，突出选择的自由，认为个人可以在荒诞的世界里决定自己的生存方式。在90年代初期的北大环境中，不仅是对贺老师个人，存在主义风潮在当时的学生群体中都有广泛的影响。

本科后期还短暂地喜欢过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因为书中典雅而华美的意蕴曾一度深深吸引着贺老师。

本科之后的贺老师就开始离这些东西越来越远，而转入女性主义、后现代

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理论和专业化的当代文学研究。

加缪·改变

加缪的《置身于阳光与苦难之间》是影响贺老师很大的一本书，她对这本书的理解也经历过一个变化的过程。

喜欢加缪的书，一开始是被其中情绪和诗意的表达吸引。贺老师印象最深的是书中的两个意象，一个是少年的加缪在刚刚下过豪雨的海边，感到人的渺小与脆弱，同时伴有巨大的孤独，感到宇宙和世界的壮丽；另一个意象是，中年的加缪在陌生的城市，正值正午时分，他形容阳光好像空中的鸽子一只一只掉下来的感觉。贺老师最早接受的就是加缪这样一些意象性的东西，也许还是因为年轻，总觉得孤独，因而容易被这种表达方式打动。

随着阅读的深入，书中哲理性的、关于生存态度的内涵更为凸显。书中一句话是“我们要对现在说是，对未来说不，但是对过去含泪微笑，沉默不语。”承认现在，不谈过去，但是对未来我们要说“不”，并按着自己的方式决定。这样的句子体现了加缪精神性内核的东西。

存在主义·学术影响

存在主义作为本科期间对贺老师影响最大的理论，对她的学术也有着具体的影响。

本科三年级时，贺桂梅老师曾很投入地写过她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她把加缪、沈从文、海德格尔、米兰·昆德拉等“创造性”地融到一起，探讨沈从文四十年代在文学上的转变。这个时期的沈从文创作，表现出了对文学、社会、哲学乃至宇宙本体的广泛而深刻的思考，在散文式的、碎片式的文学表达背后其实有很大的思想追求。但是90年代初期的研究者很少有人探讨这个面向的沈从文。贺老师以存在主义理论为媒介，来接近这个时期的沈从文思想。后来这也成为贺老师本科毕业论文的题目。

本科阶段之后，贺老师接触了更多的理论。不过她说明，“理论”与“哲学”是有区别的。“哲学”涉及关于人生的一些基本伦理问题，而“理论”更主要是一种阐释模式。她后来所熟悉的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脉络上的理论，更多突出人的被动性，强调人是历史的、社会的构成物。但对贺老师而言，如何能够同时强调人的能动性，也就是人在

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被动的前提下，如何能动地创造主体性，这一点依然是在存在主义的脉络上展开的。存在主义对贺老师来说，是哲学或生存伦理一样的东西，与她怎样理解自己的生活和生存态度都有密切的关联。从这个意义上，学术和生活之于贺老师不是分开的，对于文学方面的学术研究是她寻求到的一种表达自己的方式。

贺老师坦言，这么多年专注于学术研究，是因为有内在的精神诉求和动力，这和个人的性格、自己有意识的要求有关。青春期的她对存在的意义，对世界和人的本质的思考，并没有随着青春期的过去而被忘记。本科三年级确立自己的文学方向之后，贺老师找到了表达自己的方式，她将自己的观察和体会融入阅读、课堂、写作和对历史的思考之中。她将自己置身其中，投入情绪、情感和愿望，和专业化的文学研究建立起了情感性的关联，表达自我的诉求和困扰，并努力尝试从中寻求解决方案。文学和学术研究对于贺老师来说，并不完全是知识性的操作，最重要的是通过自己的方式去理解生活与世界。每个人面对自己的困扰都有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对贺老师来说，她的方式就是置身文学研究之中，学术和生活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

贺老师认为这也是她学术研究的动力所在。

北大·那些人

聊过了书，再来聊聊影响过贺老师的那群人。

贺老师说，进北大是她人生之中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北大的新天地为她开阔了视野，使她结识很多优秀的人。

在研究生时期，对贺老师影响最大的老师，主要是戴锦华老师和洪子诚老师。

戴锦华老师有着犀利的语言，这份“犀利”不是所谓“聪明”，而是深入理论内部并把握了理论最本质的东西，同时又经过个人的体认而获得的，所以在语言叙事非常犀利的同时却又是血有肉的表达和体认。因此贺老师不仅感受到了全新的理论，还为戴锦华老师人格和生存方式所倾倒。戴老师所讲的理论，大概都带有某种解构的、反思的性质，经过和戴老师学习理论，贺老师认识到“语言学转型”的重要性。人和现实的关系不是直接的，我们所说所听所感都经过了语言的媒介，它们不是如镜子一样直白地照见一切，而是经过了语言这个中介。意识到所有的东西包括价值、现实、理解世界的方式都是一种语

言的建构，就会更自觉地考虑用什么样的语言，如何建构或解构那个东西，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能动性如何参与进去。

洪子诚老师则是很严谨的学者。研究生时期的贺老师喜欢有激情的东西，喜欢具有强烈主观性的、情感性的东西，而洪老师的学术却有点“冷”，所以当时觉得接近洪老师的思路有点困难。到了博士的时候，贺老师开始自己亲身处理一些文学史问题，慢慢领悟到洪老师是把他的情感、诉求、理解化到了看起来冷冰冰的学术研究里。洪老师教会了她严谨、学术规范、隐藏主观性，以及更为学术性的表达方式。

除了老师，还有同龄人对她的影响。贺老师说她最好的朋友是本科的时候确立的，那是一个人人生中最开放、最活跃的时期。当时性格偏于孤独内向的她，在同龄朋友的陪伴下，会化解许多紧张的事情。研究生时期最重要的伙伴是一个六七人的小团体，大家时常一起吃饭、喝酒、抽烟、聊天，交流各种信息和学术心得。中文系老师戏称他们为“烟酒会”。北大的氛围在同伴之间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个性·推荐

说到喜欢的作家和作品，贺老师分别谈了起来。

“最喜欢的中国作家要算丁玲了，而且是喜欢她的人甚于她的文学。”丁玲一生大起大落，很难想象早期的“摩登女郎”莎菲如何变成晚期的“马克思主义”老太太。尽管丁玲有如此丰富的人生经历，却还是保持了一个文学家最优秀的品质，那就是一种细腻的体认世界的方式和非常丰富的内心情感。可贵的是，这种品质贯穿了丁玲的一生，艰苦甚至残酷的遭遇和磨难不曾打垮她，她坚韧地用自己的精神包容了一切。而这正是贺老师欣赏丁玲的地方。

至于当代文学作品，贺老师坦言，也许是因为自己曾像医生一样用手术刀剖析过这些作品，因此很难言“喜欢”某一个作家作品，而常常只是欣赏某部作品的某些侧面。比如《长恨歌》中创造性的虚实巧妙结合、阿城的《棋王》、张承志和韩少功的一些散文。她认为当代中国作家还缺乏更高的视野和心胸，反思的意识不够，没有一部站得很高、可以让她不断地吸取营养的作品。

随后，贺老师谈起了她喜欢的理论家福柯。福柯同时超越了那种“人想干

什么就干什么”的幼稚的主观主义和“人什么也干不了”的被动的悲观主义。首先我们要清楚自身的处境和制约我们的权力结构，有能力看到这个权力结构是怎样被构造出来的，由此，我们也能知道它存在缝隙、矛盾和错位的地方，从而借助这个权力体制本身的问题，带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去改变它。

最后，贺老师还有一个给同学们的建议，那就是要眼光放开，不要仅仅局

限在专业课成绩上，而多多去关注外面的世界，比如人艺的戏剧、小剧场的新剧目、影院的新电影，都可以广泛地接触。因为年轻的时候看过了解过的东西，会以各种方式对我们发生影响，错过了这个时机，以后是很难弥补的。

作者：贺桂梅

来源：北大校友网

伍尔夫：一个人要怎样读书

首先，我要请大家特别注意我这个题目末尾的问号。对于这个问题，即使我能为自己做出回答，这个回答也只适用于我自己而不适用于你们。因此，关于读书方面，一个人能对另一个人所提出的惟一劝告就是：不必听什么劝告，只要遵循你自己的天性，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作出你自己的结论，就行了。

如果我们之间在这一点上能取得一致意见，我才觉得自己有权利提出一些看法或建议，因为你们决不会允许它们去束缚你们自己的独立性，而这种独立性才是一个读者所拥有的最重要的品质。因为，说到底，对于书能制定出什么规律呢？滑铁卢之战是在哪天打的一

——这件事能够肯定。但是，《哈姆雷特》这个戏是不是比《李尔王》更好呢？谁也说不定了。

对这个问题，每个人只能自己给自己拿主意。要是把那些身穿厚皮袍、大礼服的权威专家们请进我们的图书馆，让他们告诉我们读什么书、对于我们所读的书估定出什么样的价值，那就把自由精神摧毁了，而自由精神才是书籍圣殿里的生命气息。在其它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受常规和惯例的束缚——只有在这里我们没有常规惯例可循。

但是，要享受自由，我们当然也得对自己有一定限制。我们不能徒劳无益地、愚昧无知地浪费掉自己的精力，为

了给一个玫瑰花坛浇水，把半个宅子全喷洒得精湿。我们必须在当场准确有力地培养自己的能力。但是，很可能，这就是我们在图书馆里首先要面对的一个难题。“当场”是什么呢？猛然看起来很可能不过是杂七杂八的一大堆。诗歌和小说，历史和回忆录，词典和蓝皮书；各种性情、各种民族、各种年龄的男人和女人用各种文字所写的书全拥挤在架子上。屋外驴子在嘶叫，妇女们在抽水机旁聊天，马驹在田野上奔跑。我们从哪里开始呢？我们怎样才能把这数量巨大的浑沌一团理出一个头绪，以便从我们所读的书里获得最深刻、最广泛的乐趣呢？

说起来好像很简单：既然书有种种类别(小说，传记，诗歌)，我们只要把它们分门别类，找出各自理应给予我们的东西就行了。但是很少有人向书要求它们能给予我们的东西。我们读书的时候，想法常常是模糊不清和自相矛盾的：我们要求小说一定要真实，诗歌一定要虚假，传记一定要把人美化，历史一定要加强我们的偏见。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先把这一类的成见全都排除干净，那就是一个值得赞美的开端。不要向作者发号施令，而要设法变成作者自己。做他的合作者和同伙。

如果你一开始就退缩不前、持保留态度并且评头论足，你就是在阻止自己、不能从你所读的书中获得尽可能丰富的意蕴。但是，只要你尽可能宽广地敞开你的心胸，那么书一开头的曲曲折折的句子中那些几乎察觉不出的细微征兆和暗示，就会把你带到一个与任何别人都迥然不同的人物面前。沉浸于这些东西之中，不断熟悉它们，很快你就会发现作者是在给予你，或者试图给予你某种远远更为明确的东西。

一部三十章的长篇小说(如果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阅读小说的话)就是一种创造出来的像建筑物一样形式固定而又受到严格控制的东西。但是语言不像砖头，它是无法触摸的；阅读过程比观看过程更费时间也更为复杂。也许，要了解小说家创作的种种要素，最便捷的办法不是阅读，而是写作，是亲自动手，对于语言使用中的风险和艰难进行一番试验。那么，就回想一下在你心里留下清晰印象的一个事件吧——譬如说，你在街头走过时，碰到两个人正在谈话：一棵树正在摆动；一个电灯正在摇曳；谈话的腔调既有点滑稽、又有点悲哀；那一瞬间似乎包含着某种完整的幻象、某种精纯的构思。


但是，当你试图用语言把这个事件重新组合起来的时候，你却发现它分裂成为千百个印象碎片。有些印象必须削减，其它印象却要加强；在这过程中你也许会完全丧失对于情绪本身的控制。那么，丢开你那些模糊不清、凌乱不堪的稿子，再打开某个伟大小说家(笛福、奥斯丁或者哈代)的书吧。这时候你就更能体会到他们的高超技艺了。这时候，我们不仅是面对着作者这一个人，笛福、奥斯丁或者哈代，而且是在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里生活。

譬如说，在《鲁宾逊漂流记》中，我们像是行走在平坦的大路上；事情一件接一件发生；细节和细节的顺序——这就是一切。但是，如果露天和冒险对于笛福意味着一切的话，它们对于奥斯丁可就毫无意义了。她的世界是客厅，是谈话的人们，是通过他们谈话的多种映照显示出的人们的种种性格。而当我们习惯于客厅生活及其种种印象之后，刚一走向哈代，我们又被旋转到了相反的方向。我们四周是荒野，我们头顶上是星辰。心灵的另一面这时也暴露出来了——在孤独之中阴暗面占了上风，而不是在交际场合里所显示的光明面。我们现在所要面向的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人与大自然和命运的关系。然而，

尽管这种种世界如此不同，每个世界又是自有天地、和谐一致的。

每一个世界的创造者都小心翼翼地遵守着他自己的视角规律，所以，不管他们对我们的理解力造成了多么沉重的负担，他们总不会像有些小作家那样使我们迷惑不解，因为小作家常常在一部小说里引进了不同种类的现实。这样，从这一个大小说家到另一个大小说家那里去——从奥斯丁到哈代，从皮考克(托马斯·拉夫，皮考克(1785—1866)，英国小说家和诗人，雪莱的朋友。)到特罗洛普(安·特罗洛普(1815—1882)，英国小说家。)，从司各特到梅瑞狄斯——就好像是被揪着连根拔起来，先向这个方向再向另一个方向抛扔。读一部小说是一门困难而复杂的艺术。如果你打算利用小说家(伟大的艺术家)所能给予你的一切东西，你就必须不仅具备极其精细的感知能力，而且具备非常大胆的想像力。

但是，瞥一眼架子上那些品类不齐、乱七八糟的书本，就可以告诉你作者很少是“伟大的艺术家”；而且，通常的情况很多书压根儿就不是文艺作品。例如，那些跟小说和诗歌打头碰挤在一起的传记和自传，那些大人物的传记，那些早就死去并且已经被忘记了的人们的



传记，难道因为它们不是“艺术作品”，我们就可以不读它们了吗？或者说，我们仍然要读它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带着不同的目的去读呢？打比方说，傍晚时分，我们徘徊在一所住宅门前，这时灯火已经点亮，窗帘尚未拉下，宅子里每一层楼房都向我们显示出人生的一个断面，我们的好奇心油然而生——难道我们不可以首先用满足这一类好奇心的态度去读传记吗？在这种时候，我们对于这些人的生活充满了好奇心：他们家的仆人们正在闲聊，绅士们正在用餐，一位姑娘正在打扮自己去参加晚会，一位老太太正坐在窗口编织东西。他们是谁？他们是何等样人？他们叫什么名字？他们的职业是什么，有些什么样的思想和经历？

传记和回忆录正是回答如此这般的问题，把许许多多这样的住宅照亮；它们向我们显示人们如何进行他们的日常事务，辛苦工作，失败，成功，吃喝，憎恨，热爱，直到死亡。有时候，我们正在观看的时候，住宅暗淡了，铁栅栏消失了，我们到了海上；我们去打猎，航行，战斗；我们置身于野蛮人和军人当中；我们去参加重大战役。

再不然，要是我们高兴的话，也可以留在英国这里，留在伦敦，但场景仍

然变换着；街道变得窄了，房屋变得小了，屋子里非常拥挤，镶着菱形的玻璃窗，发出恶臭气味。我们看见了那位诗人邓恩，他被迫逃出了这样一所房子，因为墙壁太薄了，孩子们一哭叫，他们的声音就能把它穿透。我们可以跟随着他，通过书里所写的路径，一直跟到退肯南（英国地名），到贝德福夫人的庭园——那本是贵族们和诗人们的著名聚会之地；然后，我们移步来到威尔顿（英国地名）那所处于丘陵下的大宅子里，去听锡德尼向他的妹妹朗读《阿卡迪亚》（锡德尼应他的妹妹彭布鲁克伯爵夫人请求写的田园风格的传奇故事）；再漫游在那一片沼泽地带，看一看在那部著名传奇中频频出现的苍鹭；然后，再跟另一位彭布鲁克夫人安妮·克利福德向北旅行，去到她的荒原，否则就一头扎进城市，不过碰上身穿黑天鹅服装的加布里尔·哈威正和斯宾塞（哈威(1545—1630)和艾·斯·宾塞(1552—1599)均为英国诗人，二人为朋友）辩论诗歌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笑出声来。

没有什么比在黑暗与辉煌交错的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磕磕绊绊地摸索行走更有趣的事情了。但是也不能一直待在那里。因为坦普尔（威廉·坦普尔(1628—1699)，英国外交家和散文家）和斯威

夫特、哈利和圣·约翰（英国十八世纪政治家，均属托利党）在向我们招手；要理清他们之间的争论、破译出他们每个人的性格，需要花费一个又一个小时才行；如果我们对他们感到厌倦了，可以继续向前遛达，走过一位身上珠光宝气的黑衣贵夫人，去找约翰逊博士、哥尔德斯密斯和加里克；再不然，高兴的话，就渡过海峡，去会见伏尔泰、狄德罗和杜·德凡得夫人（法国贵族夫人（1697—1780），她家的沙龙为著名学者伏尔泰等人的常往之处）；然后回到英国和贝德福夫人的庭园一度所在地、蒲柏（蒲柏（1688—1744），英国诗人）后来也住过的退肯南（有些地方、有些人名就是这样不断重复出现！），再到华尔浦尔（华尔浦尔（1717—1797），英国小说家）在草莓山的家里。

但是，华尔浦尔又给我们介绍了一大群新相识，又有许多人家要去拜访，许多门铃要去拉，譬如说，在贝利斯女士的门台前面，我们就很可能要犹豫片刻，因为，看哪，萨克雷也走过来了；他是华尔浦尔所爱的这个女人的朋友；如此看来，只消从这个朋友到那个朋友，从这个花园到那个花园，从这个宅院到那个宅院，我们就等于从英国文学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而且常常会猛然醒悟，

发现在眼前又回到了老地方——要是我们还能把眼前这一时刻跟从前所有已经消逝的时刻区分清楚的话。

那么，这也就可以当作我们阅读传记和书信的一种方法；我们可以用它们来照亮过去时代的许许多多窗口；我们可以看看那些早已死去的名人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习惯，有时候还可以设想：我们既然和他们这样接近，说不定能意外发现他们的什么秘密；我们还可以抽出他们所写的一部剧本或者一首诗，看看当着作者的面把它读一读会产生什么不同的效果。但是这么一来就又引出另外一些问题。

我们一定要问：一部书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作者生活经历的影响？——生活中的这个人去说明书的作者，这到底有多大的可靠性？而且，语言这东西既是这样灵敏、这样容易接受作者性格的影响，那么，我们对于他这个人在我们心中所引起的同情和反感，究竟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加以拒绝、又在何种程度上予以接受呢？这些就是当我们阅读传记和书信时压在我们心上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自己作出回答，因为涉及到这样一个纯属个人的问题，要是完全听任别人的偏好来指导，那未免太危险了。

但是，我们也可以带着另外一种目的来读这一类的书籍，不是为了阐明文学作品，也不是为了熟知那些名人，而是为了提高和锻炼我们自己的创造能力。在书架的右边不是有一个打开的窗户吗？停止阅读、向窗外看一看该是多么愉快！那景致，正因为它那无意识、它那无关联、它那永远的变动不居，又是多么令人鼓舞：几匹马驹在田野上绕着圈子奔跑，一个女人在井边往她的水桶里装水，一只驴子把头高高仰起、发出长长的刺耳悲鸣。任何图书馆里大部分的书籍不过就是像这样的男人们、女人们和驴子们生活中短暂瞬间的记录罢了。

任何文学，一旦过时，总会积累起它的废旧书堆，总会留下它那用已经老化的、颤抖无力的语言对于已消逝的时代和被忘却的世事所作出的记录。但是，如果你有兴致沉浸于阅读废旧书籍，你就会对于那些已被摒弃、任其腐烂的人世生活陈迹感到震惊，甚至被它们所折服。那也许是一封信——但它描绘出什么样的一幅图象！那也许只是几句话——但它们使人联想到什么样的一种远景！

有时候，会碰到一篇完整的故事，充满妙趣和感染力，而且首尾完整，仿

佛是某位大小小说家的手笔，然而它其实不过是一个旧时代的演员，泰特·威尔金生（英国演员），在回忆琼斯上尉的奇特经历；或者只是威灵顿公爵麾下的一一个年轻中尉爱上了里斯本的一位漂亮姑娘；或者只是玛丽亚·艾伦（英国十八世纪音乐家查尔斯·伯尼的续弦夫人与其前夫所生的女儿）在空荡荡的客厅里丢下她手里的针线活，叹气说她多么希望自己早该接受伯尔内博士的好心忠告而没有跟她的利希私奔。这些材料没有任何价值，完全可以弃置不顾，但是当窗外的马驹在田野上绕圈子奔跑、一个女人在井边往她的水桶里装水、一只驴子在嘶鸣，这时候，偶尔翻翻这些废旧书堆，从遥远的往昔岁月中扒拉出几个指环、几把剪子或者几只打破的鼻子，又是多么引人入胜啊！

但是我们终久会对读废旧书籍厌倦的。我们会倦于在废旧书中搜寻，只为了找出所需要的东西，好将威尔金生、班伯利和玛丽亚·艾伦们所能提供给我们的一半实情补充完整。他们没有艺术家的驾驭和删简材料的能力；他们甚至不能把他们自己生平全部实情都说出来；他们把一个本来可以成为井井有条的故事弄得残缺不全。他们所能提供给我们的只是事实材料，而事实材料乃创

作中的低级形式。因此，我们就产生了一种愿望，要结束这种不完全表现和近似估计，要停止搜寻人类性格中的细微差别，而要享有更大程度上的抽象，享有创作中更纯粹的真实。

因此，我们就创造出那种情境，强烈而具有共性，不注意细节，而用某种有规律并反复出现的节拍来强调气氛，它的自然表现形式就是诗歌；当我们几乎能够写诗之时，也正是阅读诗歌的好时候。

西风啊，你什么时候才刮？

好让小雨轻轻落下。

我的爱何时回到我的怀抱？

我好安卧在自己的床榻。（英国十六世纪一名无名诗人的诗）

诗歌的冲击力是强烈而直截了当的，在那片刻之间，除了为这首诗所感动之外再也不会会有任何其它感觉。我们一下子就投入了何等深邃的境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抓住；也没有什么东西阻挡我们的飞翔。小说给人的幻觉是逐渐形成的；小说的效果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是，当人们读这四行诗的时候，谁还会停下来问一问诗是谁写的，或者在心里想起邓恩的家或者锡德尼的秘书，再不然，把这四行诗卷入纷纭复杂的往昔岁月和连续不断的世代交替中去呢？诗

人永远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初读诗的一瞬间，我们的身心是集成的、紧缩的，就像个人感情受到猛烈冲击时那样。但是，后来，那感触才像水波涟漪似的扩大着圈子在我们的心里展开，以致延伸到遥远的含意；于是开始了理性的探索和评论，我们也意识到回声和反射。

强烈的诗情能覆盖广大的感情领域。我们只用比较一下，先体会面两行诗中开门见山的力量：

我要像一棵树似的倒下，找到自己的坟地，

万事皆空，只把我的悲痛回忆。（英国莎士比亚同时代剧作家波蒙与弗莱彻合著的剧本《少女的悲剧》（1619）的台词）

再品味下面这段诗中抑扬顿挫的韵律：

在沙漏中，分分秒秒的时间
都用沙粒的沉落来计算；

我们的一生眼看白白过去，

时光在任欢中耗尽，走向坟墓，

到头来，一切都在悲哀中结束；

人，厌倦了放荡胡闹，回了家，
一面叹气，一面细数着黄沙，

沙粒落尽，长眠结束了灾难生涯。

（英国剧作家约翰·福特（1856—1839）的剧本《情人愁》（1628）中的台词）

再看看这段诗中的宁静沉思的情调：

无论我们年轻或年老，
我们的命运，我们生命的中心和归宿
都是，而且只能是，与无限同在；
也与那永远不死的希望同在，

还有努力、渴望和期待，

那努力，它永远存在。（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长诗《序曲》第四部中的一段诗）

把它和这四行十足完美、无限可爱的诗句放在一起：

看，巡行的月儿升上高空，
无挂无碍，哪里也不留停，
她轻轻柔柔地上升，

陪伴她的只有一两颗星星。（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的长诗《古舟子咏》中的诗句）

或者，再比较一下这种光彩夺目的想像：

此人出没于森林，
信步漫游，一直不停，
猛然看，密林之中，
一片火海正在燃烧，
冉冉卷起一片火苗，
他灵机一动，想道：
番红花开放在树梢。（出处不详）

现在，就让我们想一想诗人的多姿多彩的艺术手法；想一想他那使我们既做演员又做观众的能力；想一想他那熟谙人物性格、既创造出福斯塔夫又创造出李尔的能力；想一想他那既会压缩又会扩大、展示的能力吧。

“我们只用比较一下”——这句话说出了秘密，承认了阅读的复杂性。刚才说的第一步，以最大的领悟能力去接受书中的印象，只不过是全部过程的一半；如果我们想要从另外一个人所写的书中获得全部的乐趣，就得完成全部的过程。我们必须对这些形形色色的印象作出判断；我们必须根据这些一闪即逝的形象形成一个固定而持久的形象。但是也不必太急。且等灰尘落下、争论和疑问平息；不妨去散步，去聊天，去撕下玫瑰花的干枯了的花瓣，再不然就去睡一觉。然后，突然间，自己想也没有想到——因为大自然就是如此安排这种转变的——这部书又回来了，但是不一样了。

它完完整整地浮现在心灵上面，而一部完完整整的书是与根据分散的词句所接受的零星印象大不一样的。种种细节都安放在各自适当的位置上。整个形体，从头到尾，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一个谷仓、一个猪圈、或是一座大

教堂。现在，我们才能把书与书进行比较，正像把建筑和建筑进行比较一样。但是这种比较行为也意味着我们态度的改变；我们不再是作者的朋友，而是他的裁判官；正像作为朋友，我们再体贴同情也不算过分一样，作为裁判官，我们再严厉苛刻也不算过分。

难道那些浪费了我们的时间、滥用于我们的同情的书籍不是罪犯吗？难道那些写下虚假的书、捏造的书、使得空气中充满腐朽和病毒的书的作者们，不是全社会的阴险敌人、败坏者和污损者吗？那么就让我们对它们严加裁判，让我们把每一本书和同类中最伟大的作品进行比较。

好在有一批评价早定的书形体鲜明地高悬在我们心目之中：《鲁宾逊漂流记》、《爱玛》、《还乡》。就拿我们正读的小说跟它们来比——哪怕是最近的、最微不足道的小说也有权利与最优秀的小说一同受到裁判。诗歌也是如此——当对于抑扬节奏的陶醉平静下来，辞藻的炫目光辉也消失了，一种想像中的整个形体就会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一定要拿它与《李尔王》、与《菲德尔》、与《序曲》比较；否则，如果不与这些作品比较，就与那些同类中我们认为最优秀的作品相比。我们可以确信，新的

诗歌和小说的新颖之处不过是它的极肤浅的特点，对于我们在裁判古老作品时所使用的种种标准，只需稍稍改动，不必另起炉灶。

不过，要是认为阅读过程的第二步，即判断和比较，也像第一步那样简单——认为对于那些纷至沓来的数不清的印象只用宽广地坦开心胸就行，那也未免太愚蠢了。撇开眼前的书本而将阅读过程持续下去，拿这一个整体印象和另外一个互相对比，既进行过足够广泛的阅读又有足够的判断力做出生动活泼而且富有启发的比较——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更困难的是再进一步提出：“我要求它不仅是这一品类的书，而且还是具有某种价值的书；因此，它在这个地方失败了，它在那个地方成功了；这里写得好，那里写得不好。”

要想完成读者的这一部分任务需要有极大的想像力、洞察力和学识，恐怕任何一个人都很难具备这样的天资；哪怕最自信的人也只能在他自己身上找到这些才能的一点点萌芽。那么，把这一部分阅读任务干脆豁免，而让那些批评家，那些身穿厚皮袍、大礼服的权威专家们，去替我们对书的绝对价值作出决定，难道不是更聪明些吗？然而，不行！我们可能会强调感应的价值；我们在读

书时可能会设法把自己隐藏起来。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可能完全抱着同感，也不可能把自己完全埋没起来；因为总有一个捣蛋鬼在我们心里悄悄说：“我恨，我爱”，而我们也无法使他不发声。

的确，正因为我们有恨、有爱，我们跟诗人和小说家的关系才那样亲密，所以我们对于另外一个不相干的人插在中间出现感到不可容忍。即使意见与人不合，即使我们判断错了，我们的趣味，那能够使得我们身心激动不已的感应命脉，仍然是我们的主要照明灯；我们是凭借感情来学习的；我们不可压抑我们自己的癖好，使它贫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许可以培育一下我们的趣味，使它接受某种制约。当它已经贪婪而杂乱地吞吃过各种各样的书籍——诗歌，小说，历史，传记——然后停止阅读，而渴望着在活生生的世界的多样性和不协调之上寻求辽阔的空间，这时，我们就会发现它有点儿变了，它不是那么贪婪了，而是更注意思考了。

它不光是给我们带来对于这本书那本书的判断，而是开始告诉我们某些书的某一共同特点。它会说：听着，这一点该叫作什么？它也许会先向我们读一读《李尔王》，再读一读《阿伽门农王》，以便向我们揭示出这种共同特点。这样，

在我们自己的趣味引导之下，我们就可以大胆超越某一本书的范围，去寻求把某些书籍组合成为一类的那些特点；我们可以给它们起名字并且制定出某种法则，把我们的感受归纳得有条有理。这样分门别类，能使我们感到一种更进一步的、更难得的乐趣。但是，法则的生存规律向来是在与书籍本身的接触中不断被打破的——在真空中制定出与客观事实毫无联系的法则是再容易不过、也再愚蠢不过了——那么，在这种艰难的尝试中，为了使我们自己保持稳定不乱，最好是求助于那些非常罕见的作家，他们能在把文学当作一门艺术这个问题上给我们以启发。

譬如说，柯尔律治、德莱顿（约翰·德莱顿(1631—1700)，英国诗人和批评家）和约翰逊的那些经过深思熟虑写下的批评文章，以及许多诗人和小说家的那些未经深思熟虑发表的种种言论，都常常是贴切中肯得令人吃惊——他们能把在我们心灵深处的云山雾罩中翻来滚去的那一团团模糊概念加以照亮并且固定成形。但是，当我们向他们请教时，头脑里必须装满了在我们自己的阅读过程中老老实实积累起来的问题和意见，他们才能对我们有所帮助。如果我们只是聚集在他们的权威影响之下、像一群

绵羊躺在篱笆的阴凉中似的，他们对我们是无能为力的。而且，对于他们的裁决，只有当它与我们的判断发生冲突并已把它征服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

既然如此，既然像应该那样地读一本书需要具有想像力、洞察力和判断力这些罕见的素质，你们也许会下结论说文学是——一门非常复杂的艺术，那么，我们即使读一辈子书也不可能对于文学批评做出什么有价值的贡献了。

是的，我们只能一直做读者；我们不可能戴上属于那些叫作批评家的稀罕人物的那只光轮。但是，我们作为读者，仍然具有我们自己的责任甚至重要性。我们所树立的标准、我们所做出的判断，悄悄散入空中，变成了作家们工作时所呼吸的大气层。

我们创造出一种感应力，尽管它不能出现在书刊版面上，却仍然影响着作家们。特别是现在，由于必然的原因，文学批评还处于不稳定状态，读者的感应力，只要它是有文化教养的、生气勃勃的、富有特色和真心实意的，就会有重大价值。因为，现在书籍评论，就像打靶场上排队走过的动物，批评家只消耗一秒钟去装子弹瞄准、然后向它们射击，所以，他即使把野兔当作老虎、把鹰当作谷仓里的鸡，或者全打偏了，

把他的弹药全浪费在远处田野上一头正在安静吃草的母牛身上，我们也可以原谅他。如果除了报刊上这种不准确的炮火射击之外，作家能感觉到还有另外一种评论，那就是普通读者的舆论——他们只是为了爱读书而读书，不慌不忙地读，非专业性地读，他们的判断有时带着很大的同情，有时又非常严厉——难道这不能帮助作家提高工作质量吗？如果通过我们这种办法能使书籍变得更健全有力、更充实、更丰富多彩，达到这种目的也就很值得努力了。

然而，谁读书又是为了达到什么期望的目的呢？我们所不断追求的某些事业本身不就是有益的吗？乐趣不就是最终目的吗？读书不就是一种这样的事业吗？至少，我有时就梦见过：最后审判日来临，那些征服者、大法官、政治家都来接受他们的奖赏——他们的冠冕、他们的桂冠、他们的雕刻在大理石上的永垂不朽的名字，这时，当万能的上帝看见我们胳肢窝里夹着我们心爱的书本走过来了，他转过身去，不无妒忌地对圣彼得说：“看，这些人不用奖赏。我们在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好给他们。他们爱好读书。”

译者：刘炳善

来源：中国好书

好文共赏

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

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一个很普通的题目——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略微有一点特别的是，我把“中国的”这三个字加了引号，因为我主要讨论的是，究竟什么才能算中国的文化。

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从晚清以来，一直到现在，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是非常多的，从林则徐、魏源“睁开眼睛看世界”，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来讨论这个问题呢？这是因为我有以下几个特别的考虑，先向大家“从实招来”。

第一，是我们过去对中国文化的讨论，或者给中国文化的界定，往往是大而化之、似是而非的。我们有一些高度概括的形容词，可是说实话，你听完了，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不符合一个历史学者的习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得具体一点，就是什么才能算“中国的”文化。

第二，我也有我的担忧。最近这些年，很多人热衷于谈论中国文化，诸如

“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有多大的意义”，等等。可是，很多人在谈论“中国文化”的时候，首先会把它“窄化”。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可是有人却把中国文化窄化为汉族文化，然后又窄化为汉族里面的儒家文化，然后再窄化为他认为是正统、经典的儒家文化，这样就使得我们对什么是中国文化产生误解。

第三，我现在非常担心的是，当我们讨论“中国文化”的时候，有一些人带着一种很奇怪的、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文化优越感。因此，在所谓“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很多人就会有一种错觉，觉得我们中国文化优于其他文化。其实，文化是一种现象、一种特征，文化无高低，民族无贵贱。因此，我们现在需要理性地、历史地、自觉地认识中国文化，这样才能够和各种民族、各种文化有互相交往、互相理解与平等的态度。

中国文化典型的五个特点

我今天希望能够讲清楚的是，什么才是典型的中国文化。换句话说，即中国文化的特点，什么在中国比较明显，在外国不太明显，什么在中国有，外国没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它称作“中国文化”。但是，我这里还要作一个界定，下面讲的主要是汉族中国的文化。

第一个是汉字的阅读、书写和通过汉字思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要知道，现在全世界除了极少数，像中国云南纳西族的东巴文字以外，所有的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基本都在生活中消失了，只有汉字仍然和它最起初的象形性、原初性，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汉字有的是象形的，日月木水火手口刀等等，这个在古代中国叫作“文”，用章太炎的说法，这就是最基本的汉字单位“初文”。这是古人通过图像，直接描绘他所看到的事物。但是，这些字不够，就加上会意，就是在一些象形的文字上，加上一些标志意义的符号。比如说刀口上加一点，就是“刃”；爪放在树上，就是“采”；牛被关在圈里面，就是“牢”。会意还是不够用，就加上声音，成为形声字，比如说江河松柏等等。基础的汉字主要是这三类，当然六书有六种，但主要的是这三类。大家可以看到这三类，基础都是形。因此，用汉字来说话、思考、

阅读、书写，就会带来很多特征，可能会有一些重感觉重联想、但语法相对简单的特点。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中国人对于“文”和“字”，有一种自然的感受和联想。古代的“人”字，一看就是人，如果这个人嘴巴朝天，就是“兄”，兄原本不是兄弟的兄，是庆祝的“祝”，人的口朝天是向天“祝”和“咒”的意思。人的嘴巴朝前，又是什么？是哈欠的“欠”。但这个嘴巴如果掉到后面呢？就是既然的“既”，这是吃完了不吃了，所以是“既”，即已经结束了的意思。汉字都非常有意思，它形成了中国文化很多特点。简单地说，汉字的使用带来了书法的发达、诗歌声律的发展，比如对偶、平仄等，这些都是单音节的汉字才有的。在古代中国，汉字这种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历史上没有中断，延续到现在，它对我们的思维、阅读和书写，都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了东亚，形成了所谓的“汉字文化圈”。

第二个特点，是“家、家族、家国以及在这一社会结构中产生的儒家学说”，这是非常有影响的。我上课的时候，尤其是给外国学生上课的时候，要出一个题，这个题就是，贾宝玉应该管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叫什么？外国人

总搞不清楚，他们说 sister，我说，没那么简单，用中国话来说，是表姐、表妹，但是，还是没那么简单。严格说，林黛玉是贾宝玉的姑表妹，薛宝钗是贾宝玉的姨表妹，史湘云隔了两代了，更远的表妹。为什么中国称谓这么复杂呢？这是因为中国的家、家族、家族共同体，要想有秩序，必须把远近亲疏关系界定得非常清楚，这就涉及到中国伦理原则和等级秩序。简单地说，这里其实就是两个原则，一个是“内外有别”，父母夫妻之间，分内和外，也就是说，女性的亲族和男性的亲族，等级远近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叔叔、伯伯，那是你的父党，同姓；但是，舅舅、阿姨，那是母党，不同姓。所以，外公外婆是外，爷爷奶奶是内，在古代中国，是分得很清楚的。第二个原则就是“上下有序”，必须讲清楚上下，伯仲季叔，分得清清楚楚，不能乱。这两个原则，在丧服制度上表现得最明显。一个人死了之后，在这个人的丧礼上穿什么衣服，一方面表示你和死者关系远近如何，一方面通过丧服，把一个大的家庭、放大的家族、更大的家族共同体联结起来。而中国的家庭、家族、家族共同体再放大，就是国家。西方不论是 country、state 都没有“家”的意思，中国偏偏有“国家”

和“家国”，因为在中国观念世界里面，国就是放大的家，家就是缩小的国，上下有序、内外有别的伦理在国家层面上也是非常严格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儒家学说。

第三个，汉族中国文化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三教合一”的信仰世界。宋孝宗、永乐皇帝、雍正皇帝不约而同讲过几乎相同的话，叫“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也就是说，儒家管社会治理，佛教管精神修养，道教管身体修炼，三教看起来蛮融洽的。其实从历史上看，这个道理很简单，在中国，佛教道教没有绝对性和神圣性，所以很难看到宗教之间的辩论，也不会有宗教之间的战争。这是中国的一个特色。

第四个特点，是中国最有趣的阴阳五行。阴阳不说了，五行有两大原则。一个是相生相克，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这是相生的轮回；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这是相克的轮转。第二个原则是，五行可以串联万事万物，比方说，五行可以配五方，东南西北中；可以配五色，青白赤黑黄；可以配五声，宫商角徵羽；还可以配五味，酸甜苦辣咸，等等。把万事万物连成一个大网络，这是我们

先人对宇宙万事万物认识的知识基础，大家现在学了科学，对这个有怀疑，但是在古代，这就是我们理解世界最关键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还产生了一整套知识和技术。

第五个，是中国天下观念，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中国古代的世界观，跟其他国家和民族很不一样。古代中国人有一个宇宙想象叫做天圆地方，就是天圆如倚盖，地方如棋局。即天是圆的，像斗笠一样，地像围棋棋盘一样。天的中心在哪里呢？古人想象在北极。古人夜观天象，视觉里天在转，地不转，因此“天道左旋”，当你面朝北的时候，天是朝左转的，你会感觉有一个地方始终不动，这就是北极，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极点。古人认为大地的中心在哪儿呢？“洛者，天之中也”，洛阳是大地的中心。这是因为这套观念形成的时候，大概是东周，那时候王都在洛阳。洛阳最了不起，特别是，到了夏至那天，“日下无影”。所以，古代中国人以洛阳为中心。想象中一圈圈放大，这就是大地的形状，所以有“九服”或者“五服”的说法，每服五百里，两边各有五百里，就是一千里，“五服”就是五千里，大地就是这么方方的。但是，从这里形成的一个观念很重要，就是越在中心的人，

文明程度就越高，越在边儿上的人，文明程度越低，这就是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中国很早形成了“华夷观念”，认为中国人是文明人，周围人是野蛮人，野蛮人要接受文明人的教化，就形成了一套“天下观念”，即以我为中心想象世界。这个想象和观念逐渐发展，不仅成为一种民族志、地理志里面的文化观念，也形成了政治制度即“朝贡体系”。

这五个方面如果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非常明显的属于汉族中国的文化。可是，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现代中国是五方杂糅形成的，就连汉族本身，也是五方杂糅的。从秦汉到隋唐，其实不断有外族进来，汉族也是逐渐吸纳、融合、杂糅了其他民族才形成的。

我一直在讲，中国文化是复数的文化，不是单数的文化。如果你没有这个观念，可能成为盲目的文化自大。

不同以往的文化转型

历史上，中国在很长时间，总是“在传统内变”，主流文化始终还是在汉族文化传统系统里面作调整，这是因为在古代中国，无论是佛教、三夷教、伊斯兰教，还是明清天主教，始终没有任何文化可以挑战和改变这个汉族中国文化，所以，变化都是在传统内部的调整、

适应、改革、变化。但是，到了晚清，由于坚船利炮、西力东渐的原因，中国不得不“在传统外变”，不得不越出传统，文化就面临危机。

从 1895 年到 1919 年，这是中国思想和文化转型最重要的时段，在这个时段你会看到很多变化，比如说皇帝变成了总统，满清帝国变成了五族共和的民国，传统帝国不得不变成现代国家；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开设议会，建立政党；剪去辫子，穿上洋装；不再叩拜，改成握手；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破除迷信，崇尚科学；解开束缚，走出家庭。以前所谓的“三纲五常”变了，变得很彻底很厉害。面对西洋和东洋列强，中国人处于一种焦虑和紧张的心态中。以前那种很自信、很安定的样子已经很难看到了，优雅、宽宏和从容，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相应地，刚刚我们讲的汉族中国的文化的五方面也出现了变化。

虽然大多数中国人仍然在用汉字，但现代汉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提倡白话文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要普及识字率，提高国民的文化程度。但是，也出现了一个新旧文化断裂的问题。以前的书面语言，也就是文言，它代表典

雅、礼貌和尊严，也代表着有教养、有文化，现在不再有了。当以前的口语变成书面语言之后，使得雅言和俗语失去等秩，同时也使雅、俗不再有分别。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这种感觉，自从白话文成为主流之后，写信已经不再有典雅方式了，电脑普及，网络流行，语言和文化的格调都没了。比如说，学生给我写信也不署名了，最后来一个“呵呵”，雅俗之间已经没有区别了。第二，现代汉语掺入了太多现代的或西方的新词汇，这些词汇进来以后，使得我们通过语言感知的世界已经变了。第三，特别是上世纪 50 年代以后，中国提倡简体字，使得文字和原来的形象之间的距离更拉大了。简体字虽然方便学习，但是离开原来的“形”，越来越像抽象符号，传统汉文化里面，通过形象的文字思考、书写和表达的这个因素，就发生了问题。

第二个，家、家族、家国，以及儒家学说，也出现了问题。虽然现代中国尤其是乡村仍然保持着一些传统家庭、家族组织，中国人至今还是相当看重家庭、看重亲情、服从长上，但是，城市化、小家庭化、人口流动，使得家庭、社会和国家的结构关系发生了变化。过去那种密切的、彼此依赖的邻里、乡党、家族关系，已经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渐消

失了。因此，儒家家族伦理与国家学说，也逐渐失去了原来的社会基础。

第三个是信仰世界。自从晚清以来，儒家在西洋民主思想的冲击下，渐渐不再能够承担政治意识形态的重任，佛教与道教也在西洋科学思想的冲击下，受到“破除迷信”的牵累，逐渐退出真正的精神、知识和信仰世界，越来越世俗化、体制化和旅游化。因此，传统的信仰世界也在危机之中。

第四个是阴阳五行，在科学的冲击下也越来越难以维持，它在现在已经不能完整地解释世界万事万物了。阴阳五行学说，现在基本只在中医、风水、食补等领域里面还保存着。在整个现代的知识系统里面，它已经到了很边缘的地方。

第五个是“从天下到万国”，基本的世界观念变了。随着晚清以后西洋进入东方，不仅摧毁了原来中国的天下观念和朝贡体制，也重新界定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古代传统里面的宇宙观、世界观、朝贡或册封体系，已完全不现实了。

上述变化说明，中国文化——尤其是汉族中国文化——已经处在一个需要重新认识和重新理解、重新更新的时代。

“文化”与“文明”有何区别

我今天一再强调，各种文化没有高低，只有文明是程度不同的。在这样一个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可能才会缓解长期以来的焦虑和紧张。我这里想引用一位德国学者伊里亚斯的见解，他在《文明的进程》这本书中提出，可以把“文化”和“文明”做一个界定和区分，即“文化”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它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因此，它没有高低之分。而“文明”是使各个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的那些东西，表现着人类的普遍的行为和成就。换句话说，就是“文化”使各个民族不一样，“文明”使各个民族越来越接近。

接下来伊里亚斯又指出，“文化”是一种不必特意传授，由于耳濡目染就会获得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而“文明”则常常是一种需要学习才能获得的东西，因而它总是和“有教养”、“有知识”、“有规则”等词语相连。就好像说，我们经常拿着球来玩，这没问题，但是对不起，一旦你上了篮球场就不能用脚随便踢，上了足球场就不可以用手抱(除了守门员)，很多人在一起玩就要有规则。虽然“文化”是让你随心所欲

表现自己特色的，但“文明”是给你一些限制和规则的。如果这样理解“文明”和“文化”，我们就不必对全球化和现代秩序恐惧，也不必担心我们的文化会被侵蚀掉，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在普遍的文明和规则中，守护好独特的文化和传统。

再接下去，我还必须说明，各个民族的“文化”往往是固守的，它表现出一种对异质“文明”的抗拒。毫无疑问，文明始终是在不断侵蚀文化，我们承认这一点，因为“文明”常常是在前进的，时时表现着殖民和扩张的倾向。也就是说，“文化”与传统有关，它是特殊的，而“文明”与未来有关，它是普遍的。这两者怎么协调？

我们今天讲汉族中国文化的特点，那么，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一个普遍文明规则下，能够保存好特别的文化，同时在现代文明的时代，能够理解

这些文化在历史中的合理性。比如说，我们在接受和赞美科学的同时，对于阴阳五行能不能有一些同情的、历史的理解？又比如说，我们在接受普遍的法律和制度的时候，能不能对传统中国的家、家族、家国的伦理和道德准则有一点历史的理解？再比如，我们能不能在接受新的文明的时候，对传统宗教也能够有一些温情？同样，我们能不能在接受万国平等原则的同时，也能对中国人理解世界的历史习惯有一点点理解？我本人是研究历史的，我一直认为，无论是文化还是文明，我们必须要在历史当中看，我们承认历史是变动不居的，我们回过头去看文化，面向未来看文明，对两者都要有同情。

来源：爱思想网站

编辑：丁香耳朵

史苑钩沉

蔡元培为什么要请鲁迅来设计北大校徽

徽者，旌旗之属也。校徽是学校办学理念 and 人文精神的艺术化体现，并反映着该校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积淀。民国时代的学生都把佩戴校徽作为一种自觉的纪律，用以证明身份、规范行为、警觉行动，并以此为荣。

北京大学是国内最早设计校徽的大学，这与其悠久的历史 and 掌舵者的文化抱负不无关系。创立于 1898 年的北京大学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大学，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并催生了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的现代学制——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1912 年 5 月 15 日，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1916 年 12 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这位以“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学，明季之东林”为圭臬的浙籍人士，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推动了北大的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使北大成为传播新文化的重要阵地。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北大虽然“上承太学正统，下立大学祖庭”，

是中国古代最高学府在现代的延续，但是并没有校徽这一新生事物，亦即没有专属自己的旌旗标识，学生与教工出入极不方便。蔡元培上任后的第二年，即 1917 年，即出面请鲁迅设计北大校徽。

1917 年的鲁迅和陈独秀、胡适等人相比完全是两种状态，他每天到教育部上班，下班后便躲在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抄写古碑，这一年鲁迅日记中大量记载了购旧拓本、买汉画像、搜集古镜等事。半隐居的鲁迅常常感到孤独和愁闷，他说自己：“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起来，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但这并不等于鲁迅处于沉沦之中，他的心中燃着向往民主科学的火焰。接受蔡元培委托后，鲁迅便着手设计北大校徽，并于 8 月 7 日“寄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学徽章”。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造型是中国传统的瓦当形象，简洁的轮廓给人现代的感觉。“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上部的“北”字是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像，

下部的“大”字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有如一人背负二人，构成了“三人成众”的意象，给人以“北大人肩负着开启民智的重任”的想象。徽章用中国印章的格式构图，笔锋圆润，笔画安排均匀合理，排列整齐统一，线条流畅规整，整个造型结构紧凑、明快有力、蕴涵丰富、简洁大气，透出浓厚的书卷气和文人风格。同时，“北大”二字还有“脊梁”的象征意义。鲁迅用“北大”两个字做成了一具形象的脊梁骨，借此希望北京大学毕业生成为国家民主与进步的脊梁。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被刘半农戏称作“哭脸校徽”，但鲁迅将校徽图样寄交蔡元培后即被北大采用，一直延续到1949年，后又因历史原因长期弃用，上世纪80年代又重新使用。2007年6月，北京大学发布《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管理手册》，正式推出修改后的北大校徽标识，这一标识正是在鲁迅设计的校徽图案基础上丰富和发展而来。

从鲁迅日记可知，鲁迅设计北大校徽前后，曾与蔡元培有几封重要的通信，惜乎今已散佚，无法探知鲁迅设计北大校徽的初衷和设计过程中的细节。但当年蔡元培为什么要请鲁迅而不是其他美

术专业人士设计校徽，完全可以从蔡元培和鲁迅交往的过程中得到钩证。

蔡元培和鲁迅是绍兴同乡，前者比后者大13岁。从某种意义上讲，身为朝廷翰林院学士的蔡元培是后学鲁迅的师长和伯乐，身为教育总长或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则是鲁迅的上级。1912年，蔡元培被孙中山力荐为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后，便开始延揽人才。蔡元培对推荐鲁迅的许寿裳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鲁迅从绍兴进教育部后，二人由此结识、订交。鲁迅在致蔡元培的信中，总是恭敬地起于“鹤庐先生左右”，收于“专此敬请道安”，署以“晚周树人谨上”，不敢有一丝一毫马虎。鲁迅被聘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科学、美术馆、博物院、图书馆、音乐会、演艺会等事宜。虽然鲁迅在那里上班的最初感受是“枯坐终日，极无聊赖”，但是，在蔡元培的提携下，鲁迅开始了他14年的公务员生涯，这在他的一生中非常重要，倘若“没有沉沦官场的自我省察，没有憔悴京华的人生洞悉，更重要的是，如若没有绝望心情下的魏晋感受，没有勃兴于北京的新文化思潮的托举，没有亦官亦教的双栖经历，就不会有狂人的一声凄厉，又何来

《彷徨》的复杂心态，在心灵的废园里将难见疯长的《野草》，更不要提《中国小说史略》。尤其不堪设想的是，文学热情一旦退潮，透支的沙滩上会留下些什么，就怕是什么也不能生长，什么也不可建造。”（吴海勇《时为公务员的鲁迅》）鲁迅借此触摸到了生活的质地。可以说，没有蔡元培的提携，鲁迅的人生也许就得改写。郭沫若说：“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吧！这位有名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贡献相当大，而他对于鲁迅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歿，蔡元培是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此言很有见地。无论在行政隶属关系上，还是在人情世故上，后学鲁迅都有责任有义务为蔡元培所托效力。

蔡元培托鲁迅设计校徽，是对其美术功底与美学主张的信任与首肯。鲁迅一生虽然没有专事美术，但自幼喜爱美术，有着很好的美术训练，比如用“明公纸”描摹绣像小说等。鲁迅是现代美术的旗手，他领导的左翼木刻运动即使放到同期西方大景观中也毫不落伍，很多精神和品质在今天都不过时。鲁迅非常重视美术教育，1913年，他在任职教

育部佥事期间，发表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显示出了对美学源流的深入了解，集中阐述了对美术教育的观点，认为“美术之用”在于“表见文化”、“辅翼道德”和“救援经济”，指出：“美术真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多方面阐明播布美术的重要性，主张将美术“传诸人间，使与国人耳目接，以发美术之真谛，起国人之美感，更以冀美术家之出世也”。鲁迅的这些主张与蔡元培的主张不期而遇，与蔡氏可谓心有戚戚焉。蔡元培毕生注重美育，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曾派王家驹筹办北京暑期讲演会，以“从事学问，阐发理术，宏深造诣”，蔡氏对鲁迅的美学见解极为首肯，便指派其讲授《美术略论》，鲁迅十分乐意地接受了这一任务。蔡元培被迫辞职后，新任总长竟把“美育”删除，代之以道德教育，鲁迅对此感到极为愤恨：“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黄裳先生认为鲁迅在美术园地的辛勤耕耘与他在《自由谈》上所写的战斗杂文，“几乎是双峰并峙的同样的战斗工作”，此言极确。正是由于鲁迅不俗的美术功底以及蔡元培与鲁迅在美育方面的心思相通，使蔡氏毫不犹豫地把设计校徽的重任托付给了鲁迅。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突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正是“五四”前夜先进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对人的价值、尊严、个性与创造精神进行肯定与张扬的表现。这一对后世影响至深的思想潮流体现在鲁迅的平面设计上，便以大气、简洁的形式诠释着北大的过去、现在与将来，成就了现代标识史上的经典作品。“北大者，为囊括大典，包罗万众之最高学府”，“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蔡元培）其时还处于蛰伏期的鲁迅是抱着对北大的期望，抱着对改造旧社会的热切期望设计北京大学校徽的，并以此反映了“五四”前夜的时代风潮。

1925年，北大建校27年的时候，鲁迅写了一篇短文《我观北大》，发在1925年12月的《北大学生会周刊》创刊号上，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北大的态度：“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并且坚信“北大究竟

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鲁迅关于北大的这段文字，几乎可以看成是对北大校徽的文字注解。

来源：中国网

编辑：丁香的花朵

■ 大美北大

燕园夕照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丁香耳朵

学员心声

圆梦北大，为了更大的担当与责任

寒来暑往，又一届北大继续教育圆梦计划优秀学员返回北大，告别燕园。

两年前，当我手持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我知道我的圆梦之旅已经开启。在入学后的第一次班会上班主任老师告诉我们关于优秀毕业生返校的案例，从那一刻起，我带着这一目标，带着梦想，带着憧憬，我以百倍的努力完成了为期两年半的圆梦学习。两年来的感恩与收获将会一直陪伴着我砥砺前行，今天我的愿望实现了。

2016年7月4日，北大继续教育学院广州学习中心一行11人赴北京大学参加北大的毕业典礼。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怀着激动与兴奋地心情踏入北大之旅，感谢北大继续教育学院为我们搭建如此好的平台，感谢广东教学中心全体教师给予我的机会，让我圆了梦寐以求的愿望。

炎热的夏天，阻挡不了前行北大的路，踏上火车去北大，带着好奇，

一路欣赏沿途的风景。进入圆梦园校区那一刻，饭堂叔叔阿姨不辞辛苦，准备好丰盛的饭菜，迎接我们的到来。进入干净整洁的宿舍大楼，老师们热情招待，有条不紊办理住宿手续。让来自五湖四海的圆梦学子感受到强烈的归属感。

7月5日一早从圆梦园校区出发北大本部，带着期待，惊喜来到本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邱德拔体育馆，也是毕业典礼开展的地方。在等待中不忘拍照。在进体育场馆的时候，学员们有序地跟着带队老师按照规定的位置就座，坐在宽敞明亮，威严耸立的体育馆中等待典礼开始。在诗歌朗诵《永远的校园》中，典礼拉开了帷幕。在大屏幕播放视频中，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影像记录着北大毕业生在燕园生活的点点滴滴，这一幕打开了北大学子记忆的闸门，共同回顾往昔岁月；虽然未经历过，这一刻见证了美好的回忆。

师生代表们深情地朗诵《永远的校园》诗歌，让每个北大学子都和这个校园相联系。让人难忘的是校长，校友代表和学生代表发言。校长发表《网络时代更需要理性》对我们学生要求信息时代，我们要培养独立思考，明辨是非，坚持真理的能力；要有宽广的视野，正确的历史观和社会责任感；要求我们毕业生走出燕园，不仅要具备专业知识和生存能力，还要有坚定的信念和价值观，以及守正，贡献，超越和敢为天下先的使命感。校长的讲话使青春热血的我们应该将知识与责任挥洒在祖国的热土。

校友代表邵峰院士谈到“回归根本，做简单纯粹的自我”让我更加明白选择大于努力，坚持与放弃对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性。排除干扰，回归根本，做简单纯粹的自我，是做人做事的原则。

毕业生代表李晓丹同学的发言更是振奋人心，晓丹同学能够将自己的红丝带社会志愿活动进行总结提炼，为十三五规划建言献策，值得我去学习和思考，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晓丹同学所说：“北大的光不仅在过去四年指引着我们”。我想说“北大继续教育学院的光不仅在过去三年指引

着我们，而让我时刻记住自己是一名北大人，并以北大人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

5号下午的座谈会，几位领导的分享，让我收获更多，让我明白了以下几点内容对我今后做人做事有着重要的影响。第一，理想人生不在于起点低，而在于攀上顶峰。第二，起点并不代表高度，起点并不代表终点，起点在乎最后的高度。第三，要不断学习、奋斗、谦虚、谨慎。第四，要有做人的底线和“三观”之间的关系，维护北大的底线。第五，作为北大人要多一份担当，这也是我的座右铭，促使我砥砺前行。

参观校园过程中，在老师的讲解中，让我对校园每个建筑物所代表的知识与文化内涵有深刻的了解，真正体验到北大所沉淀的文化、历史以及精神，博大精深，浩如烟海。“一塔湖图”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永远的燕园，永远的家”带着师长的寄托和期望，走向人生的下一个驿站，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努力奋斗，秉承“北大”精神，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升自己。离别之际，再次感谢北大继续教育学院两年来对我的培育，感

谢老师们谆谆教诲，老师，您们辛苦了。母校，我永远记得您。

作者：广州学习中心 常海霞

编辑： 丁香耳朵

